

未刊稿，请勿直接引用

## 第二章 苏联书报检查制度和机构的演变

英文和俄文的“书报检查制度”(censorship<sup>①</sup>/цензура)皆是从拉丁语census和censere发展而来。Censere也就是英文中的censor，意即古罗马专司公民户口调查、公众道德行为监督和指导的行政官。<sup>②</sup>《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给书报检查下的定义是：“进行书报检查，就是进行判断和批评，做出评价和估计，以及实行禁止和压制。”<sup>③</sup>

苏联官方历来不承认苏联存在书报检查制度，但是根据现在已解密的一些史料，在苏联，尤其是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党和国家拥有一整套规章制度非常完备的书报检查体制。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在经历了早期政出多门、管理混乱和斯大林时期党指挥一切之后，曾经由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高层的意见分歧在表面上看似被削弱了（其实是这些高层分歧使一些原本难以出版的作品乘“解冻”之机得以面世）。在经历了赫鲁晓夫时期的意识形态混乱之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并没能找到一条既能保证政权稳定又能促进体制改革的成功之路，其结果便是为了稳定恃蛮横打压，国内普遍施行非常严苛的书报检查。

### 第一节 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建立

#### 一、书报检查制度的初立

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列宁便颁布了《人民委员会关于出版的法令》（1917年10月27日）。这一法令对出版的管制非常严厉，遭到了一些文人的强烈抗议，如持反布尔什维克立场的女作家基皮乌斯（З. Н. Гиппиус）便激烈批评：“该法令禁止资产阶级的报纸，其实等于禁止和废除布尔什维克以外其他的所有报纸。”<sup>④</sup>然而，在革命中大声疾呼言论自由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何会在夺取政权之后便严格控制出版呢？联系当时的事态情势，原因便一目了然了。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之时，一次大战尚未结束。上文已述，在战争状态下不论是沙俄政府还是二月革命胜利后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都采取了对出版业的严厉管制（恢复了出版前检查）。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它所面对的敌对势力是无比强大的，因此在当时那种状态下，暂时采取对出版加强管制的措施是非常有必要的。正如法令中所言：“当此重要和决定性的转折以及之后的一段时期，临时革命委员会被迫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抵抗各种各样的反革命出版物……众所周知，资产阶级的报刊是资产阶级最强大的武器之一……只要新社会的秩序巩固之后，便将撤销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照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的充分自由……”<sup>⑤</sup>

这个法令引起了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等社会主义派别的不满，他们煽动印刷工人罢工。为了对付这种罢工，苏维埃政府对印刷工业实行了集中管理。为此，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属下设立了国有印刷企业技术管理委员会。而且，很快便把原属旧俄机构、有书报检查职能的书籍文部厅转交教育人民委员部管辖，这样就赋予了它书报检查的职能。<sup>⑥</sup>

1918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开始，面对险恶的战争环境，苏维埃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整个国家生活转上战争轨道，苏俄进入了人们习惯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时期。战时共产主义在书

<sup>①</sup> 有的学者建议用censorship表示出版前检查（pre-publishing censorship），用censure表示出版后检查（post-publishing censorship），本文采用主流说法以censorship统称书报检查制度。

<sup>②</sup> The New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Ed. By Lesley Brown. Vol. 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P. 360

<sup>③</sup>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7：342。

<sup>④</sup> 阿尔林·维克多维奇·布留姆：《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1917-1991年档案汇编》/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 4-6.

<sup>⑤</sup> 苏联政府法令（第一卷）/ Декрет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Т. 1. М. 1957. С. 24-25.转引自А. В. Блюм: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 – 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 3.

<sup>⑥</sup> 参见马龙闪：《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及其对党和国家发展的影响》，《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二期，第53页。

报检查方面的反映是非常明显的——亦即对出版事务的军事化管理，如成立了审判出版事务案件的军事法庭（1918年1月28日）。1918年6月底，建立了隶属于军事人民委员部作战部的战时书报检查局，实施对出版书报的军事检查。而且，开始尝试对出版物进行全面总体的出版前预审<sup>⑥</sup>，此一经验为后来的出版总局（Главлит）所继承和发展。进入1919年，苏俄的书报检查逐渐正规化，在国家出版社下建立了宣传鼓动部（后改名为政治部）。宣传鼓动部在书报检查事务上拥有极大的全权，甚至几乎可以说是书报检查事务的最高机构，当时俄罗斯所有的出版物发行都要经过它的许可，它也是出版总局（Главлит）的原型。在出版总局成立之后，宣传鼓动部的工作便只限于检查本社（即国家出版社）的出版物。

在粉碎了1920年4-11月协约国对苏俄的第三次武装干涉之后，除了远东地区的日本干涉军至1922年10月才被逐出国土，持续近三年的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以苏俄胜利告终。英明而务实的列宁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正式开始于1921年3月的十大之后），新创办的私人出版社和刊物如雨后春笋，在新闻出版界和高等学校出现了持不同政见现象，这使刚刚稳固的苏维埃政府难以接受，同时也给书报检查带来了极大困难。知识界的过分行径终结了书报检查的宽容时期，并逼得政府不得不采取特殊手段。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出版总局成立之前，苏维埃政府将书报检查职责分配于多个部门，管理还比较混乱。正如马龙闪所说：“在1917-1921年期间，苏俄的书报检查机制还比较混乱，曾发生政出多门，由多线头、多部门实施书报检查的现象。不过在1917-1919年间，主要是由1918年6月底建立的隶属于军事人民委员部作战部的战时书报检查局，实施对出版书报的军事检查。这便是史称的苏维埃书报检查体制的所谓政治委员专政时期。在1919年，通过合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和莫斯科、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各出版局，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之下建立了俄罗斯联邦国家出版社。这样在1919-1921年间，又改变为主要由国家出版社实施书报检查职能。这便是苏维埃书报检查体制的所谓国家出版社专政时期。”<sup>①</sup>

1922年6月6日，所有书报检查的职能都转归新成立的专门机构——图书文献和出版事务管理总局（简称出版总局）。自此至1991年11月22日，出版总局活动了将近70年。

在出版总局建立之初，其地方机构并没能同时建立起来，书报检查事务仍由国家出版社下设的政治部主管。但同时，“契卡”（ВЧК-ОГПУ）<sup>②</sup>对书报检查，依旧拥有超然越乎其上的权利，如所有编辑、出版社负责人、书店负责人、印刷所长等都必须领取国家政治管理局（ГПУ）的许可证<sup>③</sup>。许多秘密事务（可归入宽泛的书报检查范畴）也都属于国家政治联合管理部（ОГПУ）所负职权，在中央机构之下设置了政治管理局（“辅助”出版总局和剧目检查主管委员会<sup>④</sup>完成书报检查，进行邮件和电报通函暗查），秘密-政治部第四和第五分局（主管谍报资料、组织文艺和科研领域告密网和收集间谍情报）。政治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负责筹备对文艺作品的评价，有权提出建议撤销出版总局和剧目检查主管委员会的决议<sup>⑤</sup>。除此之外，国家政治联合管理部有时可以国家机密为由违反

<sup>⑥</sup> 在1922年6月6日出版总局（Главлит）成立之前，没有加盖许可印章Р.В.Ц.（Разрешено Военной Цензурой — 已通过军事书报检查），不可能出版任何题目的出版物。

<sup>①</sup> 马龙闪：《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及其对党和国家发展的影响》，《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二期，第53页。

<sup>②</sup> 详见附录（二）

<sup>③</sup> 圣彼得堡文学与艺术中央国家档案馆/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Ф. 35, Оп. 1, Д. 24, Л. 22. 转引自А. В. Блом: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 – 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 33-34.

<sup>④</sup> 剧目检查主管委员会 — Главный комитет по контролю за репертуаром (ГРК или Главрепертком) 创建于1923年2月9日，建制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之下。在1928年5月之前，隶属于出版总局。剧目检查主管委员会负责审查所有将要公演的话剧、音乐以及电影作品，检查无线电广播，编制颁布经允许和被禁止的剧目，监督相关规程条例的施行。同时也负责与剧作家和电影团体相关的工作，组织有关剧本、戏剧和电影的讨论。1928年，剧目检查主管委员会成为文艺事务总局（Главискусство —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дела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的组成部分。1933年，再次成为独立单位——剧目与演出检查管理局（ГУРК — 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контролю за зрелищами и репертуаром）。1953年，成立了苏联文化部，便撤除了剧目与演出检查管理局。

<sup>⑤</sup> 圣彼得堡文学与艺术中央国家档案馆/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章程和法律越过出版总局对书报检查进行干涉而无需说明理由<sup>②</sup>。

在 1923 年之后，在苏联书报出版中，编辑和书报检查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1925 年 9 月 7 日，首次颁布了《为保卫苏联政治-经济利益而严禁传播的包含机密的消息目录》，《目录》内容包括可能对政府产生负面影响的几乎所有方面，如失业情况、反革命袭击、民众与政府部门的冲突、监狱卫生条件、关于自杀和神经病的报道、任何对苏联书报检查的提及或暗示等等。此后，《目录》定期颁布成为出版总局领导各检查机构的重要方法。有些评论认为，施行《目录》令苏联回到了严酷的尼古拉一世时代的机关本位主义书报检查。<sup>③</sup>另外，值得补充的是，1927 年之后，国家出版社独立审核的历史最终结束，自此所有出版社都必须有出版总局的特派全权代表（уполномоченные Главлита）按照出版总局的规程进行预审，所有出版物必须由特派全权代表签署“批准刊行（Разрешаю к выпуску в свет）”<sup>④</sup>之后方能刊印出版。再有，至 1927 年，苏联政府对俄侨作品的态度也最终确立——禁止由国外引进，同时也禁止在国内印刷出版。

出版总局对图书馆藏书的管制贯穿于整个苏联时期，而在苏联早期进行的为以后图书管理打下坚实基础的清理藏书也是值得我们浪费一点笔墨的。早在 1923 年，人民教育委员部下设的政治教育部（Политико-просветительный отдел）便颁发了关于图书馆、阅览室和图书市场“已过时”藏书清理的章程，在地方实际具体工作是由人民教育局和出版总局的地方机构（在没有出版总局地方支部的地方由国家政治管理局代替）组成专门小组进行。在文件中共列出了需要从大众图书馆清除的图书约 1200 本<sup>⑤</sup>，几乎指向了所有革命前的书籍。<sup>⑥</sup>1926 年，开始了第二次清理藏书，鉴于在第一次藏书清理过程中甚至清理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别林斯基、赫尔岑、普希金、托尔斯泰等的文章，政治教育部纠正了 1923 年清理藏书的过激偏向，许多国内外知名学者的作品被排除出了清理之列。但是，到了 1929 年，第三次清理藏书时却变得比第一次更加残酷，几乎所有在“新经济政策”实行期间由私人和合作出版社<sup>⑦</sup>的出版物都在清理之列，许多极有价值的书籍都被清理了，大众图书馆藏最终“荒芜”了（此处需要补充的是，被清理的图书并非完全消失，而是归入特藏书库，一般没有特别批准是无法阅读其藏书的）。

## 二、斯大林执政时期的书报检查制度

1930 年 5 月，苏联人民委员会正式下令改组出版总局，削弱一些出版总局的职权，如“解除出版总局中央机构从政治思想和军事、经济观点方面对出版物进行事前检查的所有业务”<sup>⑧</sup>（将设党的机关代之）。改组工作直至 1931 年 6 月才正式告终，出台了新的规程条例，关于出版检查的领导和具体工作有一些变动：对出版物的事前检查划入国家出版社协会（ОГИЗ – Объединение

---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Ф. 35, Оп. 1, Д. 5, Л. 12. 转引自 А. В. Блюм: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 – 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 19.

<sup>②</sup> 圣彼得堡文学与艺术中央国家档案馆/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Ф. 31, Оп. 2, Д. 55, Л. 248-253. 转引自 А. В. Блюм: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 – 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 130-131.

<sup>③</sup> 圣彼得堡文学与艺术中央国家档案馆/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Ф. 31, Оп. 2, Д. 31, Л. 2-9. 转引自 А. В. Блюм: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 – 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 91-92.

<sup>④</sup> 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莫斯科）/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в Москве, Ф. 597, Оп. 6, Д. 4, Л. 16-17. 转引自 А. В. Блюм: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 – 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 123.

<sup>⑤</sup> 此处之“本”并非“几本书”中的“本”的意思，举例说明：假设《资本论》在各地图书馆各有一本或多本，内容相同，在文件中只算一本。

<sup>⑥</sup>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前“十月革命”苏联国家政权和管理最高机关中央国家档案馆）/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ГАРФ, бывший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ысших орга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и орга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СССР), Ф. 2313, Оп. 5, Д. 76, Л. 58. 转引自 А. В. Блюм: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 – 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 73-74.

<sup>⑦</sup> 自 1927 年开始，加强了撤除私人和合作出版社、全国出版国有化的工作，在此方面出版总局基本完全听命于国家政治联合管理部。

<sup>⑧</sup> 阿尔林·维克多维奇·布留姆：《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1917-1991 年档案汇编》/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 183.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 РСФСР) 系统(此时早已完成了出版行业的国有化), 出版总局特派全权代表由出版社负责人担任, 其下设一专管政治检查问题的副职负责对该出版社“政治编辑”<sup>③</sup>的实际领导。<sup>④</sup>通过这次改组, 党加强了对出版总局的监督, 甚至直接参与书报检查的管理, 这是与当时“党指挥一切”局面的逐渐形成相伴随的。

1934年12月16日, 发生了震惊苏联的基洛夫被刺事件, 并引发了之后持续三年之久的肃反运动, 全国所有的机关和企业进行了一番“大清洗”。在1936-1937年间可以说是出版总局的“大清洗”第一次浪潮, 主要“清洗”了一些中下层检查员。1938年, 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委员雅哥达<sup>⑤</sup>被枪毙, 出版总局的遭遇与此类似: 包括出版总局最高领导印古洛夫(С. Б. Ингулов)在内的所有高层领导干部都被逮捕了, 印古洛夫被判枪毙<sup>⑥</sup>。

为补充上文所说的“党指挥一切”, 下面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党组织中参与书报检查的机关。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上的报告中提出建议“集中党的宣传和鼓动事务, 合并主抓宣传鼓动的部门(отделы пропаганды и агитации)与主抓出版事务的部门(отделы печати), 在联共(布)中央会议组织下设置一个统一的宣传与鼓动事务管理局(УПА – Управление пропаганды и агитации)”。根据斯大林的提议, 1938年8月3日, 原宣传与出版事务部(АППО – Отдел по агитации и пропаганде и печати ЦК ВКП)经过改组成为了党主要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宣传与鼓动事务管理局, 该局第一任领导是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日丹诺夫(А. А. Жданов)。宣传鼓动事务管理局下设五个部: 宣传部、干部马列知识培训部、出版事务部、鼓动部、文化与教育设施部。出版事务部所负职责有“对中央、地区、省、共和国的报纸与杂志实行监察……推行党中央关于报纸的路线问题的指示……参与报纸与杂志干部人员的择选与查检……审查主要出版社的主题计划……决定报纸的印数……监督塔斯社和出版总局的工作”。原检查员索罗金(В. А. Солодин)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出版总局虽然建制在人民委员会(之后是部长会议)之下, 但实际上直属于苏共中央宣传部, 宣传部监督着出版总局, 对其直接下达指令。之后, 在级别上出版总局还从属于党中央管理意识形态问题的书记处(通常设有两个书记)……除了宣传部, 出版总局还部分接受中央文化部的领导。”<sup>⑦</sup>

大战迫在眉睫, 也许苏联政府已经闻着了战争的味道, 1941年6月2日(德军开始入侵苏联在1941年6月22日凌晨), 党中央下达了加强军事检查的指令《军事总检查员规章》:“为了加强苏联的军事检查, 设立直属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军事总检查员, 所有不同类型的书报检查都从属于军事总检查员……军事总检查员还负责审查所有邮件……”<sup>⑧</sup>在全民渴望胜利的期盼下, 适应战时需要,

<sup>③</sup> “政治编辑”负责具体的检查工作, 要对出版物进行分析和评论。“政治编辑”必须具有绝对稳定的党性, 根据不同出版物的所属的不同类型和重要性, 对“政治编辑”的党龄要求为5-10年。

<sup>④</sup> 圣彼得堡文学与艺术中央国家档案馆/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Ф. 281, Оп. 1, Д. 56, Л. 61. 转引自А. В. Блюм: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 – 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 206.

<sup>⑤</sup> 1936年9月下旬, 斯大林下令改组内务人民委员部, 雅哥达因“右倾”不能胜任肃反运动的领导而被撤去内务人民委员职务, 由叶诺夫接任。

<sup>⑥</sup> 历史-政治档案中央国家档案馆(前列宁格勒苏共档案馆)/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историк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бывший 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партийный архив), Ф. 24, Оп. 2-в, Д. 2862, Л. 82-101. 转引自А. В. Блюм: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 – 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 276-277.

<sup>⑦</sup> 该段引文皆出自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前“十月革命”苏联国家政权和管理最高机关中央国家档案馆)/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ГАРФ, бывший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ысших орга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и орга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СССР), Ф. 9425, Оп. 2, Д. 19, Л. 99-136. 转引自А. В. Блюм: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 – 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 289-294.

<sup>⑧</sup> 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国家档案馆(前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原理和历史研究所档案馆, 1991年10月之后至1999年的俄罗斯当代史档案研究与保存中心)/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ГАСПИ, бывший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партийный архив Института теории и истории социализма ЦК КПСС, затем РЦХИДНИ - 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и изуч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Ф. 17, Оп. 125, Д. 65, Л. 126. 转引自А. В. Блюм: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 – 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 314-315.

书报检查的施行准则、责任追究与惩罚条例愈益清晰，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检查”（самоцензура），极大地简化了书报检查的程序和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当苏联转守为攻之后，在苏联从法西斯手中解放出来的东欧国家也实行了类似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及其盟友战败，苏军在其占领区内缴获了大量珍贵的档案和图书。这些档案和图书被装箱分批运回了苏联，为保存这些档案和图书，1946年3月9日，建立了特别中央国家档案馆（ЦГДА –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особый архив）。特别中央国家档案馆从属于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只允许内务部极少数工作人员（如有工作需要，需经过严格的审批）进入。战后，因为苏联已是英美等国的盟友，许多外文书籍作为赠送品进入了苏联。在1949年，出版总局对获赠外文书籍进行了检查，清理（通常烧毁）了其中“有害”的图书。稍早，自1947年开始，开始对国内藏书进行清查，这次清查较之二三十年代更为残酷。需要补充的是，除了特藏书库，这一时期还建立了“限用期刊基藏”<sup>③</sup>（主要是1917-1939年的期刊，其中含有大量在“大恐怖时代”已被“清洗”的党和国家或者社会知名人士的人名）。“限用期刊基藏”也是需要特批的，想要进入“限用期刊基藏”，必须持有单位的特殊指令（表明相关人员的科研工作确实需要阅读“限用期刊基藏”内的期刊，而该单位一般要事先向出版总局和国家安全部门申请并获得许可）。

在斯大林逝世之前，在“冷战”不断加剧的国际背景下，自1946年开始，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一系列批判运动。其目的“主要是肃清残余的资产阶级观点，反对无批判地宣扬资产阶级文化，反对科学文化和艺术领域中放弃马列主义立场，克服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崇拜西方资产阶级反动文化的各种表现，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爱国主义的自豪感，培养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和忠诚。这场运动由党中央直接发动和领导，时间长，范围广，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sup>④</sup>在对文学杂志《星》、作家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的批判中，在有关哲学、经济学、遗传学的争论中，在反对打击“列宁格勒反党集团”和“反革命犹太医生恐怖集团”的斗争中，在“反犹太人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sup>⑤</sup>的运动中，出版总局坚定不移地遵循支持党中央的相关决议，对“有害”作品进行封杀。

## 第二节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书报检查制度

### 一、意识形态委员会与书报检查机构调整

1953-1964年间从事书报检查工作的主要机关仍然是出版总局（Главлит）<sup>①</sup>，从这一时期出版总局档案走向看来，参与这项工作的还有内务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宣传鼓动部（Агитационно-пропагандистский отдел）、国家安全委员会（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文化部（отдел культуры）、意识形态委员会（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等部门。这些机构在不同阶段与出版总局配合，共同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控制。

1953年3月到10日出版总局处于内务部管辖之下，其全称是出版业军事与国家保密事务全权管理局（Управление Уполномоченного по охране военных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тайн в печати）

<sup>③</sup>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前“十月革命”苏联国家政权和管理最高机关中央国家档案馆）/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ГАРФ, бывший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ысших орга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и орга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СССР), Ф. 9425, Оп. 2, Д. 186, Л. 10. 转引自А. В. Блюм: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 – 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 365-366.

<sup>④</sup> 王斯德、钱洪：《世界当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01年，第153页。

<sup>⑤</sup> 对犹太人的态度，苏联完全继承了沙俄时代打压的传统，而且有过之无不及。绝大多数“犹太问题”相关的著作在苏联是严禁的，在苏联的犹太人一如既往地受到歧视，对于犹太作家的作品出版有严格限制。

<sup>⑥</sup> 该机构成立于1922年六月，起初是建制在教育人民委员会之下、归人民委员会系统管辖的图书文献和出版事业管理总局（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делам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简称出版总局（Главлит），其后先后隶属于数个不同的党政机关，机构、名称和职能范围也随之几经改变，但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始终承担这对文艺作品的书报检查职能。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СССР), 原内务部副部长奥麦里琴科 (К.К.Омельченко)担任局长, 具体任务是防止特殊时期社会动乱的发生。1953年7月奥麦里琴科接到一份通知对出版总局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规定, 工业、交通运输业、国家机关发生的意外事故、火灾或破坏农业生产和森林的自然灾害, 发生在苏联领土境内的地震或者其他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总体损失及人员伤亡情况禁止报道, 甚至只对建筑物毁坏情况等灾难结果进行报道也是违法的。说明此时的该机构与内务部一同肩负国家安全职能。

1953年十月以后出版总局转由苏联部长会议管辖, 其全称为出版业军事与国家安全事务管理局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охране военных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тайн в печати (Главлит) при Совете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安全职能逐渐消弱, 次年该项职能被国家安全委员会所替代<sup>①</sup>。

1957年宣传鼓动部副部长罗曼诺夫 (П.К.Романов)被任命为出版总局局长, 目的在于加强党的领导, 之后此人主持国家书报检查事务长达二十年。

1958年出版总局在无论在机构上还是职能上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是年2月, 出台了新的《出版总局工作条例》明确指出政治意识形态监控不再有出版总局负责, 并且废除兼职编辑——检查员体制, 改由各报刊编辑直接负责, 并且为避免与地方当局的矛盾各出版社完全从属所在地党和政府。<sup>②</sup>同年8月出版总局交给中央委员会一份书面建议, 要求抓紧科学技术和经济领域的管理, 此前由于赫鲁晓夫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版总局也负责科技方面书报检查, 由于过于庞杂它不得不将其一部分职能交给文化部和其他一些行政机关。

文化部是这一时期变化最大的部门, 1953年3月, 对国家各部位进行改组, 起初, 把包括高等教育部、劳动资源部、电影部、艺术事务委员会、无线电情报委员会、广播委员会和国家出版印刷总局在内的所有文化方面的管理机构都并入文化部, 后来由于文化事业日渐复杂, 专业门类日趋繁多而几经分流, 最终变成一个只领导文化艺术事业的部门, 负责对戏剧、音乐、文学、图书馆和戏剧学校进行管理。<sup>③</sup>1961年5月出版总局又增加了监督外国记者新闻稿这项新的职能, 1963年成为苏联部长会议之下国家出版委员会的一部分, 其全称随之改为出版业军事与国家保密事业管理局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охране военных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тайн в печати (Главли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по печати)。

1960年, 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决议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织结构进行一些调整, 增强了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检查方面的监督作用。国家安全委员会与苏共中央和出版总局及其他相关单位联合一起进行政治检查, 并利用其特殊技术和手段监控文学艺术领域中的个别流派和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艺术家。出版总局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文艺领域实行打击和镇压措施的不可或缺的助手, 它总是在第一时间通知党中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出版业中所发现的“违规事件”或者反苏言论, 而且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常就有关文学和艺术的评论问题(确定相关作品是否有意识形态

<sup>①</sup> Herman.Ermolaev: *Censorship in soviet literature 1917-1991*, 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1997. p.143.

<sup>②</sup> Горяева Т.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М. РОССПЭН, 2002. С.312.

<sup>③</sup> 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第264-266页

误导或反苏倾向)发函咨询出版总局。

而赫鲁晓夫时期书报检查制度最显著的变化是意识形态委员会(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的成立。1958-1962年间苏联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主要由这个机构负责主持。

第一个意识形态委员会创建于1958年1月,是一个隶属于苏共中央的临时机构。其规定职责是研究国际宣传、国际工人运动的技术问题、监督这些问题在出版物中的反映,监督苏联情报局、国家文化委员会的对外活动以及对外广播节目的政治倾向,监督科学、文学、艺术领域具有政治或意识形态意义的事务,委员会还负责外派和引入专家的一系列具体工作。但是,实际上,委员会几乎不从事理论问题和技术问题的研究方面的工作,而是为具体问题起草和通过决议,当事务超出其职权范围时,则由苏共中央的书记处和主席团做出最终决定。根据当时的传统,所有中央委员会下属机关发布的决议都被概括性的称为“中央委员会决议”,因此意识形态委员会的决议也与苏共中央的决议具有同等效力,并且一般都是“机密”或“绝密”文件。由于其自身活动特点委员会在运作方式上模仿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该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是苏斯洛夫(М. А. Суслов),其成员全部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委员或候补委员。

1962年11月以后意识形态委员会职权范围大为缩小,地位也大大降低,虽然增加了管理教育的职责(包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但不再负责研究国际问题和运动问题,和对具体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也不能通过任何决议,而只负责讨论草案和提交建议,由苏共主席团和书记处下达决议。最终该委员会于1966年5月根据政治局决议被废除。然而在现代文献保存中心(ЦХСД)的档案资源中只保存着直到1964年以前的档案,而且这些档案在当时已由秘书处工作人员转入此地保存,这种情况使人们推测,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该委员会实际上可能已经停止运行,但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委员会地位和职能的变化在其档案组成上也有所反应,前期的意识形态委员会,其档案为决议及其草案和中央委员会各部门和主管机关的书面报告的形式,1962年10月以后,委员会档案则多为其会议或会见文学艺术界人士的速记记录。从其1958-1962年间的档案构成可以发现,该机够在此期间处于苏联书报检查体系的核心地位,所有的相关部门包括党的机构和政府机构,不论是宣传鼓动部、文化部、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是出版总局,他们对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都要想意识形态委员会报告,在哪里汇总,最终由它代表苏共中央作出最终决议。

其次从运作体系上看,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推断,此时的苏联书报检查制度已经形成了一个操控社会的三角结构——苏共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出版总局。书报检查中的事前检查逐渐形成双层模式——出版总局——党中央——出版总局,出版总局审查完毕做出评论,然后提交给党中央的相关部门(如苏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党中央部门做出指示发给出版总局,由出版总局依照指示许可出版、禁止出版或要求作者对作品进行修改。虽然由于机构庞杂权限不明而时常做出相互矛盾的决定,但是在总体上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控制,因此虽然在解冻之初出版总局的地位有所下降书报检查系统看似弱化,实际上赫鲁晓夫改革所摒弃的只是镇压手段而没有也不可能放弃书报检查本身,相反还不断调整各机关之间的关系,使这个系统更为健

全。因此有学者称之为书报检查制度的现代化（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системы цензуры），这一进程一直持续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

## 二、书报检查制度在各领域的实施

### 1、书籍出版问题

这一时期苏联政府仍在使用超文化、超经济手段强行干预书籍出版工作，完全忽视市场和文化产业本身的发展规律，对本国作品的控制仍然主要集中在文学、艺术类作品上，而对待外国作品的态度与前一时期相比则发生较大改变，只是有时这种改变显得很微妙，而且从根本上说态度仍然是非常谨慎的。具体分述如下：

首先是本国文学方面。

1959年3月一份档案显示，文化部指责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和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出版社一味再版此前出版的作品，而完全不出版苏联作家的新作品，他们认为不断再版当时仍然健在的苏联作家旧作品和重复出版稿酬支付办法不会促进苏联文学发展和长远进步，不能实现作家新作品的物质价值，导致“很多在过去从事写作并受到读者好评的作家近些年已不再进行创作，他们不创造新的文艺作品而靠重复出版旧作品为生”而要求对现状进行改革。不顾市场需求强制鼓励新作品出版这便是前述所说超经济超文化的证明了。

一些关于20年代的回忆相继发表可以看作是“解冻”的重要标志，但是此前仍然要经过严格的检查。

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几乎每一部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我们知道，书报检查是文学艺术类作品发表或出版的必经环节，但是，即使过了事前检查这一关，日后发现问题还是会受到指责。1960年爱伦堡回忆录《人·岁月·生活》（Люди годы жизнь）在波兰的《政治》（Политика）周报与苏联《新世界》杂志同步发表。这部回忆录主要讲述了作者的学生时代，和他在莫斯科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组织活动以及后来受到监禁直至侨居巴黎的经历。书中谈到了爱伦堡在俄国和侨居岁月中见过的一些人，包括卢那查尔斯基、托尔斯泰等以及在巴黎的一个名为“洛东达”（Ротонда）的咖啡馆里结识的一些法国文学艺术界知名人士。大概是爱伦堡流露出的对巴黎的感情让这位苏联驻波兰大使感到不满吧，他指责爱伦堡在书中多处提到生活的阴暗面、是片面的不真实的，尤其是在对待现状的态度上。并指出：“在回忆录中爱伦堡明显为他在青年时代在巴黎与那些文学家的相识感到自我满足，但此后在很大程度上这却成为一个壁垒，使之没能在新的苏维埃俄罗斯找到自己的位置”。<sup>①</sup>

1960年12月《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把爱伦堡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的第二部送到出版总局进行检查，并准备在1961年杂志的第一期上进行发表。出版总局由于不赞同爱伦堡对待一些不受政府欢迎的文化界人士的态度而责令其进行修改。比如帕斯捷尔纳克（Б.Л. Пастернак）和女诗人茨

<sup>①</sup> В.Ю.Афиани,З.К.Водоньянова,Т.В.Домрачева,АппратЧК КПСС и культуры1958-1964Документы,М.: РОССПЭН,2005.С.407

维塔耶娃（М. И. Цветаева）。尽管爱伦堡在谈到帕斯捷尔纳克时已经表示自己并不同意他的一些观点，并指责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总是脱离生活，而只是表达了他个人对诗人及其作品的喜爱之情，称“帕斯捷尔纳克是当代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之一”就已经让书报检察机关无法容忍。<sup>①</sup>

1963年当这部回忆录第五部的第二部分又被送往《新世界》杂志进行发表的时候，出版总局的意见是，这部分回忆录涉及到1943-1944年的一些事件，不能以公开形式发表。而苏共中央文化部的结论是“作者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到了国家社会生活的消极方面和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后果上”，根据他们的观点似乎爱伦堡在片面暗示，在个人崇拜的影响下苏联社会似乎在战争年代已经显露出社会变质的迹象“堕落到革命前的旧社会”。但是书报检查员认为这部作品的最重要错误还在于在谈及战争期间政府对待犹太人的态度问题时不够谨慎。而此前，该书第一部分（于1963年1月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出版准备阶段，他已经根据党中央的意思对一些关于政府对犹太人态度的措辞——比如谈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时说很多参加者“八年之后被捕只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进行修改。<sup>②</sup>

另外书报检察机关对那些关于二三十年代的材料也是满怀戒心。1958年《再谈马雅可夫斯基》（Новое о Маяковском）发表在多卷本《文学遗产》（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的第六十五卷上，其中公布了诗人125封私人信件，这部作品因此遭到了严厉批评<sup>③</sup>。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称书中包含的大量材料歪曲了苏联杰出诗人的形象，公布的很多材料具有个人隐私性质不符合学术利益。对诗人的描述“与国外的修正主义者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污蔑性谣言遥相呼应”<sup>④</sup>，并禁止出版。参与筹备出版该刊物的马雅可夫斯基纪念馆工作人员被解雇，《再谈马雅可夫斯基》预定要在《文学遗产》上分两级进行发表（即第65、66卷），但实际上，第66卷从来就没有出版，第65卷之后直接就是第67卷。1961年书报检察机关又从完整收录马雅可夫斯基作品的《艺术文学》（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第13卷挑出47封私人信件，高层对此进行了会谈，书报检察机关最终禁止了他们的发表，原因是他们违反了关于《再谈马雅可夫斯基》的相关决议。<sup>⑤</sup>

出版总局1954年12月的一份档案显示，书报检查员就是否公开发表一部爱因斯坦的作品选集征求出版总局的意见，得到的答复是爱因斯坦的所有物理学方面的著作都可以公开出版，放在图书馆的公共书架上供读者自由阅读和使用，而在因斯坦的另外两本著作则被禁止广为传播，因为他们不是科学技术方面的而是爱因斯坦的文章和演讲选集，其中谈到了爱因斯坦对世界和平问题的看法，其中有些价值观念与苏共意识形态是相悖的。由此可以看出，与前一时期相比，在赫鲁晓夫时代，在对待外国作品问题上，书报检查有所放松是政策的主流，至少科学技术作品可以不加限制的

<sup>①</sup> В.Ю.Афиани,З.К.Водоньянова,Т.В.Домрачева,АппратЧК КПСС и культуры1958-1964Документы,М.: РОССПЭН,2005.С.420

<sup>②</sup> Горяева Т.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М. РОССПЭН, 2002. С.321

<sup>③</sup> А. В.Блюм: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С.94

<sup>④</sup> Е.С.Афанасьева,В.Ю.Афиани,Л.А.Величайская,З.К.Водопьянова: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и 1958-1964Документы,М.: РОССПЭН, 2000.С.141

<sup>⑤</sup>Блюм А. 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С.394

发表，而在此前，连科学技术都要被分裂成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比如上面提到的爱因斯坦的著作，原来连物理学专业部分也会受到政府的粗暴阻挠和攻击，还出现过类似《贝利亚与相对论》（Берия и Теор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сти）<sup>①</sup>这样的文章。

除此而外对于其他方面的国外作品，苏联政府放松书报检查的同时仍然保持着一如既往的谨慎。在出版总局和意识形态委员会的档案材料中，有很多涉及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批判。意识形态异己的作品当然不能公开发表，即使对于那些“进步”的书刊或杂志也会因为略微的不合乎要求而遭受批判和限制，比如法国的《思想》（Mind）杂志，书报检查员认为：“这是一本进步的杂志，以进步观点甚至常常是以马克思主义立场看待哲学问题”、“致力于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由次引起与反对者的论战，正是由于“论战中时常伴随着敌对的污蔑性的材料”<sup>②</sup>才使书报检察机关“不得不进行干涉”至于干涉的具体手段以及这本杂志的命运，在档案材料中没能找到下文，尽管如此，苏联政府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态度已经可见一斑了。

这一时期苏联境内出版的外国作品数量明显增加，随之导致的一些问题引起了政府的不满乃至恐慌 1958 年 2 月的一份文件证明了这一点：

……在外国文学作品的选择和批判上还存在着严重错误，这些错误对苏联人民的思想教育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构成危害，在已出版的外国作品中单纯追求趣味性和惊险刺激的作品占据了过大的比重，中央尤其是加盟共和国出版社常常选择简单娱乐性风格，没有严肃的思想艺术价值的作品出版  
……

以上事实说明，在出版外国文学的实践上，缺乏一个严密的原则体系，常常放任自流，并具有随机性。一些出版社和苏联文化部的工作人员对待外国文学翻译问题态度不够严肃并因此导致了这一工作领域严重的意识形态错误。

宣传鼓动部在大量事实基础上可以断言，很多出版社已经从意识形态立场堕落到商业出发点，实际上已经倒向了商业立场，废纸充塞了图书市场的同时苏联作家的好书却没能发表……<sup>③</sup>

1958 年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一份档案显示：

苏共中央发现，一些部门和主管机关对现行外国作品引进规则造成，代替那些对国家有价值的科技著作向外引进大量的报纸、杂志，低级趣味的和纯娱乐性的带插图的出版物。类似的订书单是有害的政治思想进入国家的通道，是污蔑我国的谣言在人民中间传播的来源，导致本该用于购买有益的科技图书的大量外汇无意义的消耗。

很多部门、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其他一些组织正在破坏政府既定订购外国作品的规则，代替需要的和有价值的科学技术作品，这些组织开列了大量的对其工作性质而言并非必要的社会政治方面的报纸和杂志、低级趣味的娱乐性的插图出版物，这个不符合这些机关部门作之专业性质的订书单造成了外国作品中反苏宣传在一部分群众中传播<sup>④</sup>。于是政府做出了对这些作品的出版进行种类和数

<sup>①</sup>Блюм А. 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381

<sup>②</sup>Блюм А. 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376-377

<sup>③</sup>Е.С.Афанасьева, В.Ю.Афиаин, Л.А.Величайская, З.К.Водопьянова: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и 1958-1964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0. С.33

<sup>④</sup>Е.С.Афанасьева, В.Ю.Афиаин, Л.А.Величайская, З.К.Водопьянова: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и

量限制的决定。

而 1959 年 6 月 4 日苏共中央对外国文学出版社作出的指示则可以看作这一时期政府对外国作品进行书报检查的总体指导原则。该出版社成立于 1946 年的外国文学出版社在翻译和出版外国图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苏联人民了解国外各学科成就做出了巨大贡献，苏共中央在成人以上事实的基础上指出：

同时外国文学出版社在工作中还存在严重不足，在选择外国作品方面犯了严重错误。人民民主国家和亚非拉国家的作品非常少，出版社让人民认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生活不是通过这些国家的作品而主要是通过对这些国家怀有偏见的美英法等国的作品。选择的作品不足以引起学术界的兴趣，这导致我们经常出版一些意义不大的没有学术和实际价值的书，这些图书只能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造成危害。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作者社会经济和军事历史方面的著作在没有任何深刻科学全面指明其优缺点的序言的情况下发表……<sup>①</sup>

针对这些“问题”作出如下指示：

1 责成外国文学出版社主任丘维果夫（П. А. Чувиков）改正出版社工作中的明显不足……在所有必要的情况下给译著加上序言或引言概括作品内容指出其优点和不足

2 出版社要以选译以下种类图书作为基本任务：

A)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科学、生产技术和文学艺术作品、反应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作品以及殖民地半殖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作品。

B) 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等兄弟党派成员反映为劳动者权利和社会进步而斗争的作品和反应资本主义制度腐朽、揭露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作品。

C) 致力于反对新一轮世界大战、解决世界和平发展问题、限制武器、促进与我国的事物交流以及两种社会经济体系和平共处的国外进步组织和部分社会政治活动家的作品。

D) 资产阶级作者在哲学历史学经济学外交和法律方面的作品。这类图书的出版要限制数量并删除其中不符合学术和实际意义的部分还要加上全面的序言和注解。<sup>②</sup>

以上材料说明当时苏联政府对外国作品尤其是文学艺术类作品的审查标准非常严格，既要意识形态绝对可靠，又要非常实用。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当时引进苏联国内的外国书籍比较固定，出版数量和出版方式也受到乐严格限制。

## 2、 电影、电视、广播

对苏联政府而言电影是重要的意识形态宣传手段，此时规范苏联电影创作的仍然是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指导思想，片面重视电影的政治宣传功能势必减损其本该具有的娱乐功能，其中前者显然必须通过后者来实现。然而苏联政府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它只看到了这两种功能之间的矛盾，尤其在受到外来影片冲击的形势下，导致其所下达的决议常常也是顾此失彼、不知所云。

---

1958-1964Документы,М.: РОССПЭН, 2000.С.65

<sup>①</sup> Е.С.Афанасьева,В.Ю.Афиаин,Л.А.Величайская,З.К.Водопьянова: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и  
1958-1964Документы,М.: РОССПЭН, 2000.С.173

<sup>②</sup>Е.С.Афанасьева,В.Ю.Афиаин,Л.А.Величайская,З.К.Водопьянова: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и  
1958-1964Документы,М.: РОССПЭН, 2000.С.173

当然，在矛盾之中当局最终选择了前者。

以下文字出自 1958 年 12 月 26 日 苏共中央的一份档案文件，可以看做是这一时期苏联电影节书报检查的总体标准：

在我国银幕上充斥着很多平淡无奇、内容乏味，令观众感到不满的电影。苏联电影没能很好的表现近几年走进我们生活，并标志着国家沿着共产主义道路发展新阶段的事物。电影工作者经常回避当代生活中的主要方面和进步，不去讲述苏联人民丰富的精神世界，他们建功立业的精神动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很少创作货真价实的讲述工人阶级、农民、苏联知识分子英雄事业以及共产党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中的作用的的作品。在历史题材的影片中没能充分揭示作为真正的历史创造者的人民的作用。对于家庭、婚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等问题在很多电影作品中出现了与社会主义社会背道而驰的观点，对道德放荡的谴责力度不够。

我们的制片厂很少推出促进青年人精神面貌养成的、塑造英雄模范表达劳动浪漫主义的作品……

上映的电影不是总能考虑到电影对苏联人民尤其是青年审美情趣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很少出现好的、内容充实的喜剧电影，尽管这种风格被苏联观众广泛接受。很少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科普片和反映我国工农业伟大成就、科学技术最新成果、苏联经济文化发展前景的纪录片。<sup>①</sup>

以上这段文字表示，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想要的不过是社会生活的积极方面、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形象，并以此塑造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伟大形象、进而达到控制人民思想的目的而已。苏共中央针对以上“问题”的指示证明了这一点：

1、认为苏联电影事业的主要任务是提高电影的思想艺术水平，对我国劳动人民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方面的教育作用促进全面建设共产主义阶段人民审美品位和精神面貌的形成。

纪录片和科普影片应致力于宣传苏联国民经济七年计划，反应那些为共产主义事业奠定物质基础的人民大众的真实创造活动。

2、……我们认为必须加强儿童和青年题材影片的制作和推广以培养青年一代对党的事业的忠诚……<sup>②</sup>

就在苏联本土电影由于种种限制而裹足不前的同时，随着“解冻”的进程，这一时期有大量外国影片被引入苏联。1959 年 9 月 8 日苏共中央文化部的一份档案提到，1955 年苏联引进外国影片 63 部而到 1958 年则增加到 113 部，该文件报告了文化部接下来的电影引进计划，计划决定当年向国外引进电影 125-130 部，而 1960 年则要达到 160 部。“根据这一计划未来一年将有 120 部国产片和 160 部进口影片被搬上银幕。这样，苏联观众的注意力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的要转向那些思想和题材不符合共产主义建设任务以及苏联人民建设事业的作品。”针对这种情况苏共中央的主要对策是非常消极的，只是责令“在最短时间内为这项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制定标准”，把对资本主义国家影片的引进限制在制定领域；建议文化部缩减外国影片的放映场次和剧场数量；责令艺术领域

<sup>①</sup> Е.С.Афанасьева, В.Ю.Афиин, Л.А.Величайская, З.К.Водопьянова: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и 1958-1964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0.С.115

<sup>②</sup> Е.С.Афанасьева, В.Ю.Афиин, Л.А.Величайская, З.К.Водопьянова: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и 1958-1964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0.С.115

的中央报纸杂志编辑部刊登外国电影的评论文章以帮助苏联观众对其进行“正确的理解和评价”。<sup>①</sup>却没有积极设法鼓励国内电影事业的发展，这便是前面所说的舍弃电影艺术价值和此项事业的发展前景，片面追求政治效果的标志。

在电视领域，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电视在苏联已经得到比较广泛的普及，并成为人们认识外界的重要窗口。1959年12月12日的一份档案显示，当时苏联已经拥有电视400万台左右，70多个电视中心，和足够覆盖7000万人的转播网络。和各类出版物以及电影、广播一样，“已经成为党对人民大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但政府认为这项手段还没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于是苏共中央指示：“我们认为电视节目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苏共二十大苏联政府的内外政策共产主义建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方面的成就。对七年计划的完成情况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全方位报道，普及工厂组织的劳动经验和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成就，培养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世界主义、共产主义道德、集体主义和对劳动的热爱。”为使电视节目充分用于政治宣传，中央还责令引入党政领导和各报纸、杂志的主编以及科学、文学、艺术类活动家的定期讲话节目要求定时播放党政领导对群众关心的问题的解答等。<sup>②</sup>

广播是比较传统政治宣传方式，更是苏联政府对外进行反宣传与资本主义阵营争夺国际政治话语权的最重要手段。1958年底美国突然改变了他一贯的宣传策略，《美国之音》此前连续十年用俄语和苏联境内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大范围进行广播，而此时俄语和其他民族语言的节目明显减少，与此同时位于慕尼黑的美国超大频率远程广播站和位于罗德斯岛的流动广播站也停止了对苏广播，前者此后主要用于广播德语和部分波兰语英语节目。此前大规模敌对宣传的持续时间也相应缩短，但在某些时段增加了反苏节目数量。这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美国重点宣传对象的变化，在此种情况下苏联政府认为他们国家的广播对东方国家首先是阿拉伯国家的覆盖面积不够，对德国等西方国家的广播只在晚间进行使得听众数量大为缩小“为帝国主义宣传创造了条件”于是苏共中央于1959年1月16日作出如下指示：

- 1、责成苏联部长会议下属国家广播电视办公室在敌对广播次数密集的时段增加广播节目数量……
- 2、建议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各州委、边疆政府在使用民族语言敌对宣传次数密集的时段对广播节目进行特别检查。
- 3、责成苏联部长会议下属国家对外文化交流办公室完成如下工作：

（1）为提高苏联广播机动性、扩大海外听众范围，从1959年一月开始对德国、意大利、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日间广播。

---

<sup>①</sup> Е.С.Афанасьева, В.Ю.Афиин, Л.А.Величайская, З.К.Водопьянова: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и 1958-1964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0. С.189

<sup>②</sup> Е.С.Афанасьева, В.Ю.Афиин, Л.А.Величайская, З.К.Водопьянова: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и 1958-1964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0. С.205

(2) 在两周期限内向苏共中央提供放松对远东广播的同时调整对日本、韩国和东那亚国家广播的建议。<sup>①</sup>

苏联政府似乎只有在对外宣传上和争夺国外阵地上面临外来压力时才会显示出少有的积极，而在面对自己的人民时他却总是在防守。

### 3、 作家遗产管理

文化部于 1959 年 3 月提出了关于加强苏联各类活动家创作遗产管理工作的动议。根据该部门描述，此时苏联政府对这一方面的管理十分混乱。当时法律没有对社会各领域著名活动家的继承人权利作出任何限制，他们把这些资源当做商品进行出售并经常无法使之保存完好。与此同时还有很多机构享有保管这些材料的权利，但是非常分散。而且政府对这些材料出境未作任何限制，导致这些材料常常流到国外，被一些机构的领导者所掌控。文化部据此认为应当规范创作材料的继承，要求著作权行使一定期限后归国家所有，禁止这些材料在苏联公民之间进行交易，追究那些违法将这些材料输往国外的人的刑事责任。<sup>②</sup>是年 4 月，该部门在另一份文件中进一步指出，作家、艺术家的继承人依法享有著作权并由于自己亲属的作品而获得稿酬，其中很多人还享有国家颁发给个人的抚恤金，更有甚者他们把这些本质上属于社会财富的创作遗产当做商业标的。为获取艺术作品和手稿材料国家不得不按照持有人随意开出的价格耗费大量金钱。1956 年-1958 年间文化部为国家博物馆购入造型艺术作品共花费 349 万卢布。一些著名作家、艺术家的继承人正在浪费这些有价值的资源，他们把这些材料交给商人和投机分子并且终有一日会把他们卖光。<sup>③</sup>

针对这种情况，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认为“在立法程序上宣告这些具有社会意义的创作遗产为国家财富是必要的”，并委托苏联文化部、内务部对这些档案材料进行统计并上缴国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则进一步声称那些保存在其继承人或者其他人手中的已故作家、艺术家具有社会意义的创作材料和档案是国家财富，应交由国家保管。<sup>④</sup>

根据相关档案材料可以推测，限制这些遗产在社会上随意流通，排除由此导致的意识形态影响是导致这项办法出台的重要原因。像前面提到的《再谈马雅可夫斯基》问题那样，由于作家和艺术家的私人信件在公开发表之后，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的情况似乎时有发生，这明显会令政府感到困扰，加以前述种种，于是出此下策。

赫鲁晓夫时期书报检查制度存在的问题

通过阅读档案，笔者发现赫鲁晓夫时期书报检查制度本身最为突出的问题表现为两点，第一是官僚主义，第二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双重管理体制。通过阅读大量的档案，观察所有参与书报检查的党政机关之间的交换材料，可以发现，大多数情况下上级机关最终下达命令时的说法与下级机关在呈送报告时的说法几乎完全一致，甚至连措辞都很少改变，这说明此时书报检察机关弥漫着着严重

<sup>①</sup> Е.С.Афанасьева,В.Ю.Афиаин,Л.А.Величайская,З.К.Водопьянова: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и 1958-1964Документы,М.: РОССПЭН, 2000.С.136

<sup>②</sup> Е.С.Афанасьева,В.Ю.Афиаин,Л.А.Величайская,З.К.Водопьянова: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и 1958-1964Документы,М.: РОССПЭН, 2000.С.157

<sup>③</sup> Е.С.Афанасьева,В.Ю.Афиаин,Л.А.Величайская,З.К.Водопьянова: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и 1958-1964Документы,М.: РОССПЭН, 2000.С.165

<sup>④</sup> Е.С.Афанасьева,В.Ю.Афиаин,Л.А.Величайская,З.К.Водопьянова: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и 1958-1964Документы,М.: РОССПЭН, 2000.С.169

的官僚主义习气。日后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帕斯捷尔纳克的说法证实了这一点：

苏斯洛夫向我作了汇报，他主管国家宣传鼓动工作……他汇报说，这部作品不好不符合苏维埃精神。他的具体论据我既不清了，又不想虚构。总之，这是一部不值得重视的作品，不必出版。就做了这样的决定。我认为，在事情发展的那个阶段，除了苏斯洛夫而外，没有一个人要人读过那部小说。我连苏斯洛夫是否读过都表示怀疑。肯定也是给他提供了一份讲作品内容的三个打字页的材料，……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我可以对于是否出版、是否接受汇报人的观点的决定施加影响的时候，我却并没有亲自读过这本书。我没有读过就相信了，就采取了对创作者最有害的行政措施。<sup>①</sup>

由此看来当时很多关于包检查的重要决议都是这么做出的。上级机关在接到报告之后，完全不进行调查研究，直接采取措施。这种做法是极不负责任的，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也是非常不公平的，他们耗尽心血创作的作品，不但要经过层层检查才能发表，而且这些检查机构还不肯付出哪怕一点劳动就轻率的决定作品乃至作者的命运。在官僚主义严重的情况下，下级呈报的意见基本上也就是上级最终的命令了，那么评论一部作品是否有害，并最终决定其是否能公开发表的的任务实际上就落到了那些基层的书报检查员的头上，他们能承担起这样的任务吗？具体让我们来看一组数字。1954 年出版总局的一份档案显示：

中央委员会干部选拔及分配管理机构在中央及其他地方机关共有工作人员 6780 人，中央机关 305 人，基本是苏共党员，超过 77%。仅在外文部有所不同，47 人中只有 20 名是党员。

受教育程度上，编制内书报检查员受过中等教育的 170 人，中等教育没毕业的 57 人。在土库曼斯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出版总局 10 个书报检查员中没有一个人受过高等教育。

1955 年 1 月，在地方上有 4273 名兼职书报检查员受过高等教育的（包括毕业和没毕业的）2307 人，受过中等教育的 1489 人，未完成中等教育的 477 人。

恐怕我们很难想象这样教育程度的书报检查员可以胜任专业作家艺术家作品的评价工作，尤其是那些理论性很强的外文译著，前面已经提到，根据当时的要求被获准引进的外文社科类图书主要是此类著作。然而就在 1954 年，出版总局对其自身及其地方机构允许出版的作品干预 33000 次左右，其中 31000 起是翻译作品问题，1600 多次是政治意识形态问题，其中超过 2759 起就是通过这些出版总局机关的书报检查员作出的。<sup>②</sup>

第二个问题是书报检查的双重管理体制，这种重复检查浪费了许多人力、物力和时间导致工作效率低下，本身限制了苏联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拉克申 1963 年 4 月 25 日记的附录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它来源于当时一个书报检查员的日记：

德缅基耶夫（Дементьев）打电话说道“我们把杂志的第四期交给您检查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但是没能从您那里得到同意哪些或不同意哪些的意见，这确实给我们杂志造成了损害。要知道现在外面有传言说我们的杂志要被关闭了，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也要被撤职，检查员已经停止了行使职责，要知道这个结果的出现——我们把杂志送到书报检察机关却没能从那里得到任何消息，而如果我们想得到的话只能去党中央，这种情况下给人的印象是书报检查是不必要的环节，我们最好把杂

<sup>①</sup>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第 1499-1500 页。

<sup>②</sup> Блюм А. 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381с

志直接送到党中央。”

而这名书报检查员的回答是，他们要把政治意识形态问题上报党中央，而在关系文学发展的最重要问题上，出版总局不能作出任何决定。<sup>①</sup>

由此必然导致经过重重检查之后才付诸发表的作品，它所表达的已不是人民眼下最关心的问题。这在外国图书引进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苏共中央曾经指责外国文学出版社没能很好跟上国际图书市场走向，没有关于图书出版的最新信息，图书从翻译到筹备出版有时长达两至三年导致一些图书在引入苏联的时候，据其首次在国外发表已经过了五年乃至更长的时间。<sup>②</sup>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可以推断，类似这种情况在苏联出版界并不鲜见，造成这种结果一方面是出版社本身的责任，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考虑繁琐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作用。

### 三、对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书报检查制度的评价

首先在制度层面，前面多次提到赫鲁晓夫时期书报检查制度的特点是从出版总局到党中央再到出版总局的双重管理模式，但这只是形式上的特点，至于实质上的特点，在这篇论文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甚至不禁在想，此时书报检查是否确实是作为一种制度存在的，从档案来源上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参与书报检查的不仅是主管文化或政治影视形态控制的机关，有时一个命令的需要财政部、国民经济计划部以及其他一些机关协同完成，几乎所有的机关都或多或少的参与了这项活动，甚至包括苏联的驻外使馆。如果能把这称之为制度的话，这个制度体系未免过于庞大，而且这个庞大的体系没有一个固定的运作规则，导致很多事件的发生很容易受到一些制度外因素影响，并因此具有随机性。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面说造成《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日瓦戈医生》不同命运的原因在于，他亲自阅读了前者，而没有读后者。他在同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一次谈话中说道，“这（《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一部生气勃勃的作品，我甚至可以进一步说——这是党的作品。如果其写作上少一点天才的话，这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像现在这样的形式，他是有益的。”<sup>③</sup>由最高领导人决定文化界一件如此具体的事物，而且他的好恶可以改变主管部门已经做出的决定这恐怕不是一个事物已经制度化的表现，就算可以称之为制度，这种制度也是不成熟的。

又如，赫鲁晓夫在一次座谈会上点名严厉斥责了爱伦堡之后又在与其进行的一次单独会面上称这都是“误会”，他有权利发表一切，对他来讲不存在检查员，爱伦堡就是自己的检查员。<sup>④</sup>在当时这样的情况也许并不罕见，此前特瓦尔多夫斯基关于这种情况的评价是“领导人关于文学作品这样或者那样的意见常常取决于偶然因素，甚至取决于“消化不良””。<sup>⑤</sup>综上所述，我认为这一时期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总体特点是，体系庞大、复杂混乱和决策程序的无规则性，而这正体现了所有转折时期必然会有时代特征。

<sup>①</sup> Лакшин, 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ич: "Новый мир" во времена Хрущева, М.: Кн. палата 1991. С.127

<sup>②</sup> Афанасьева Е.С.В.Ю.Афиин,Л.А.Величайская,З.К.Водопьянова: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и 1958-1964Документы,М.: РОССПЭН, 2000.С151

<sup>③</sup> Лакшин, 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ич: "Новый мир" во времена Хрущева, М.: Кн. палата 1991.С.127

<sup>④</sup> Лакшин, 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ич: "Новый мир" во времена Хрущева, М.: Кн. палата 1991.С.215-216

<sup>⑤</sup> Лакшин, 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ич: "Новый мир" во времена Хрущева, М.: Кн. палата 1991.С.77

其次,与前一时期相比此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特点,我认为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乍暖还寒”,即书报检查制度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确实放宽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它又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宽。可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对这些原因进行分析:

主观方面,主要是赫鲁晓夫的个人因素,对于苏联这样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领导人的气质偏好等对国家各项政策的影响都至关重要。比如1950-1960年代在苏联国内对抽象主义、自然主义等现代派艺术的批评和讨论较多,在出版总局的档案中,有很多篇目就是书报检查员对这些问题的报告,很多作者和书籍由于具有此类创作风格而遭到申斥,这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赫鲁晓夫个人对该艺术流派的不认可。赫鲁晓夫出身工人家庭,年轻时自己也做过工人,很早参加革命、受教育水平不高、个性固执,作风粗暴,这都导致他不可能完全具备一个改革者的素质。爱伦堡在回忆录中提到赫鲁晓夫自称在文化问题上他是个斯大林主义者,1962年他在与文艺界知识分子见面会上的谈话印证了这一点。他说,“情况常常是这样,一位上校和一位将军争论起来,上校说的全对,将军听啊听无言以对,可他感到不耐烦了于是站起来说向右转,开步走!上校只得转身离去,就是这样,同样,你们就是上校,而我呢,对不起,是将军。”<sup>①</sup>另外,赫鲁晓夫在逐步向上爬升的过程中自身也不可避免的继承了权利的本质属性,这使他不愿意也不能够彻底改变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建立起的这套制度体系,这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所有当权者权力赖以存在的基础。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苏联政府高层内部权力斗争的强大压力,和此前制度的沉重包袱,如果还能有一些合适的人选辅助他进行改革,彼时的书报检查制度应该会比我们现在所看到了宽松很多。赫鲁晓夫很有胆略也喜欢以改革者的身份自居,爱伦堡曾谈到跟赫鲁晓夫会面时的一些细节,在说到他最重要的功绩是结束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时,他会立刻显得容光焕发发生气勃勃,而在谈话涉及某些问题的时候又突然显得疲惫不堪<sup>②</sup>。特瓦尔多夫斯基向编辑部成员讲述与赫鲁晓夫会面的时候也曾经说过,赫鲁晓夫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他并不想深入干涉文学事业,只是“似乎,他没有自己的卢那查尔斯基而感到懊恼”。<sup>③</sup>

客观方面,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是苏联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革命合法性,也就是说是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是苏联政权的合法性的另一重要来源。革命前的俄国工业虽然有了一定程度发展,但是尚未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在经济上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有半殖民地性质的依赖;政治上,沙皇政府不但实行野蛮专制而且穷兵黩武,接连不断的战争更使国力耗尽,人民早已疲敝不堪。因此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还在于他的“来日合法性”,即为人民描绘了一种美好未来的蓝图,那么日后,当这个蓝图无法实现的时候,意识形态本身就成为政权的唯一支柱。关于这一点,历史早已证明。20世纪末,当戈尔巴乔夫改革最终偏离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时候,曾经显赫一时的苏联也不可避免的在我们面前轰然倒塌。惟其如此,苏联的历任领导人都无一例外的极端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并着力于对人们意识形态的塑造,那么,靠什么来表现呢,最重要的手段当然是书报检查,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也因此更为特殊和严苛,而且也不可能

---

<sup>①</sup> А. В.Блюм: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С.2004.405

<sup>②</sup> Лакшин, 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ич: "Новый мир" во времена Хрущева, М.: Кн. палата 1991.С.215-216

<sup>③</sup> Лакшин, 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ич: "Новый мир" во времена Хрущева, М.: Кн. палата 1991.С.77

从根本上松动或废除。

其次则是斯大林模式的遗产。我们知道一种制度一旦建立就会具有一定的稳固性，并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发生某些塑造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新一代领导集体真的想要彻底改变这项制度的现状，恐怕也很难在短期内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即使通过权力将其根本推翻，这种制度的残骸仍然会以某种形式留存下来。

#### 关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书报检查制度的影响

首先对于书报检查制度本身的影响，科塞有过一段非常经典的论述，“审查者在作家和读者之间设置障碍，以此禁止作家在读者中的影响，这一事实使它成为知识生活中一个重要的但往往被忽视的决定性力量。审查者试图在读者和具有潜在危险的作家之间建起一道防护墙。当然，在很多情况下，预想坚固的墙垣不过是一层多孔的隔板。然而审查制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思想的自然流动。因此，在任何地方审查制度都是自由精神生活的障碍。”<sup>①</sup>确实，它扼杀了苏联知识分子的创作自由和知识分子的创作热情进而影响了苏联文化产业的长远发展，但另一方面就如同法国大革命前的书报检查制度使那些违禁的书籍限制在富有的人群之中<sup>②</sup>一样，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致使那些违禁的思想被限制在那些知识分子上层当中，他们可能以一本刊物的编辑部，其中某个人的住所，或其他一些形式为中心传播着这些作品和思想，这实际上有助于他们更加团结一致，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

其次就该时期的书报检查制度而言，“解冻”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希望，20世纪80年代末，很多从那一时期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评价赫鲁晓夫时都称他曾是自己的“希望”。就像前面格罗斯曼所说的那样，一些作品在斯大林时代根本没有发表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知识界理所当然呈现出万马齐喑的景象，他们不敢想、也没想过要表达任何不同意见，但赫鲁晓夫时代不同了，“解冻”之后书报检查制度重新收紧势必会扼杀知识分子心中已经开始萌芽的希望，我想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在他们中间培养出某种绝望的情绪，其表现是此后在苏联日益繁荣的地下出版物（самиздат и тамиздат）其实正是发端此时。

### 第三节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书报检查制度

#### 一、该时期书报检查制度概述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解除了一切党政职务，勃列日涅夫被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以纠正赫鲁晓夫的政策失误为出发点，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但同时又表示坚持“二十大”的基本政治路线，不改变方向。在人事更换上，勃列日涅夫没有进行大换班，只清除了一批赫鲁晓夫的亲信，基本保持了组织稳定性和政策连续性。同时，勃列日涅夫政策调整的重点放在加强中央集权、克服地方分散主义、稳定干部队伍上，如将赫鲁晓夫执政后期一度分成工业和农业两个系统的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重新统一起来，恢复工业部门的中央管理体制，废除赫鲁晓夫时期实行的干部定期按比例更新制度。勃列日涅夫的一系列政策迎合了大多数党政干部的愿望，也符合当时人心思定的社会情绪，巩固了勃列日涅夫政权的社会政治基础。

早在1963年6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便确定了倾向保守的关于文化监控的决议，强调了从前

<sup>①</sup> 刘易斯科塞：《理念人》，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90页。

<sup>②</sup> 刘易斯科塞：《理念人》，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93页

“文学艺术党性”(партийность литературы)的论点,对“自然主义”(натуралистический)的、“阴暗”(серый)的、“形式主义”(формалистический)的、“反人民”(антинародный)的现代派作品进行了批判。以上所列各种文学作品与苏联政府意识形态是相矛盾的,但此时政府对于这些偏流尚无直接打压,主要是教育这些作者认识到自己的意识形态错误。但是当苏联历史迈入勃列日涅夫时代,赫鲁晓夫时代的宽松气氛消亡殆尽,在“斯大林模式”回归的同时,政府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也逐渐严苛。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 1965 年 12 月 11 日呈交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了一些刊物的路线错误以及国内许多作家在国外出版社出版著作的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结论很明显——需要采取果断措施,实行公开打压。苏联政府书报检查制度的“预防性检查”和官方的政治宣传运动使苏联知识分子发生了分裂:大多数拥护党的政策,而少部分则持反对态度,即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政府对“异端分子”的公开压制不仅引发了长期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以及之后的人权保障运动,也导致了苏联文化的分裂为书报检查下的官方文化和通过“地下出版物”<sup>②</sup>传播的非官方文化。这样,不与政府妥协的知识分子便只能“隐蔽”起来偷偷写作,或者被逮捕、审判、拘禁以至驱逐出境。

苏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出版总局的三角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国家安全委员会逐渐恢复昔日国家保安机构的强势,而党组织机关在文化操控方面的行政指挥功能也愈益膨胀,出版总局在意识形态监控领域却越来越走向非中心的边缘:自 1963 年 8 月至 1966 年 8 月,出版总局于特权机构的关系比较疏远,权势也不复以往,由苏联部长会议的直属单位改为隶属于部长会议下的国家出版事务委员会(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по печати)。出版总局对自己的地位下降非常不满,一直努力恢复昔日的辉煌。当时,国内政治意识形态情势发生了变化,文学艺术界开始着重批判‘歪曲社会主义现实’的‘创作自由’以及‘无党性’、‘非政治倾向’。对于一些崇尚言论自由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再是仅帮助其认清错误而已,对其中顽劣不改者实施强硬处置——开除党籍、公职,或审讯判刑,或驱逐出境。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1966 年,出版总局终于恢复了以前的地位,在新出台的书报检查工作章程中,强调了意识形态路线限制以及检查员的责任,重新直属苏联部长会议直至 1991 年初。出版总局重新开始从事以前在预先监控和调度中的工作,并且在监控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分析角色有所增强。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保安人员一起,出版总局的工作人员为苏共中央准备关于国内文化和社会生活、知识分子的主张和倾向、国外媒体对上述现象的报道等等的详细情报资料,这种情报侦察和监控的交叉方法使苏共能够在最短时间最大限度掌控意识形态。

对于这种“恣意横行”书报检查制度,最先公开表示反对的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1967 年 3 月 16 日,索尔仁尼琴寄给第四届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一封信(将于第三章中详细介绍),在信中他分析了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历史,批评党、出版总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在

---

<sup>②</sup> 关于самиздат(直译为自我出版物,指的是民间自己“不合法”地使用简陋的印刷机器刊印和复印的出版物或与之相关的印刷出版体系)和тамиздат(指在国外出版发行后运回国内的苏联地下出版物或与之有关的印刷出版体系)的译法:现在一般将самиздат译为“地下出版物”,笔者认为,此译法尚有待学界讨论。本文暂将самиздат和тамиздат统称为“地下出版物”,而将二者分别音译为萨密兹达和塔密兹达。

文学艺术领域的专横完全扼杀了作家的创作自主性，使他们只会听从上面的通告。索尔仁尼琴呼吁更改苏联作家协会规章，消除一切（公开和秘密的）书报检查。大约 80 名作家响应了索尔仁尼琴的号召，联名给苏共中央去信，要求撤除书报检查。<sup>①</sup>在 1967 年 11 月 7 日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前夕，一些学者、院士、文人、艺术家约 100 多人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交了《信息传播与获得法律草案》（Проект закона 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и, отыскании и получении информации）<sup>②</sup>。该法案有些过于超前，不仅反对任何形式的书报检查，还要求清除与国际其他国家和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人为阻隔。法案力图解决很多不同领域的人权保障问题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如信息的传播与获得、限制干涉私人生活、版权保护、以法律手段解决冲突等等。

显而易见，对于以上种种要求，不论政府还是社会都还没有准备好。结果与知识分子要求的正好相反，书报检查非但没有被撤除，反而得到了加强。出版总局提议：“对严重违反出版前材料预备制度的人追究严厉的行政责任……如有泄露禁止出版的信息，增加作者的应付责任。”<sup>③</sup>1968 年的布拉格事件<sup>④</sup>促使苏联国内外形势发生剧变，书报检查制度亦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布拉格之春”令保守派对于改革益加恐惧，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日益尖锐。同时，勃列日涅夫开始破坏“三驾马车”的领导机制走向个人集权，而苏联的政治斗争又往往是以理论、意识形态批判的形式进行，这必然使得意识形态问题突出重要，而这也必然要求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重要环节——书报检查制度。苏共中央书记处 1969 年 1 月 7 日下达的密令《关于加强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文化艺术部门领导对于出版物和剧目思想政治水平的责任》（Секретное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 повышени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органов печати,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дения,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 учреждений куль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за идей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уровень публикуем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и репертуара）更加表明了高层的立场：“在意识形态斗争极其残酷的形势下……各组织、部门和编辑部集体的领导应对出版物的思想倾向负直接责任……出版社和印刷、广播、电视机关以及文艺部门的某些领导对于主题思想谬误作品的出版没有采取尽职的预先防止措施，与创作者之间的工作进行得非常不好，在思想谬误作品的出版问题上表露出了自身的妥协退让和意识形态无原则。意识形态机关的一些个别领导试图将这方面的责任推给苏联部长会议下的出版业国家保密事务管理总局……”<sup>⑤</sup>这种严苛的书报检查制度不仅令创作人难以忍受，同样也使出版社的领导十分头疼，由于责任的威胁，他们经常被推入抉择艰难的境地，在自己的良心同职位二者中进行抉择。

自此，苏共中央将所有意识形态监控调节的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中（所有出版前检查都由编辑

<sup>①</sup> Горяева Т.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М. РОССПЭН, 2002. С. 333.

<sup>②</sup> АП РФ – Архи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 3, ОП. 78, Д. 8, Л. 46-56. Перечит. по: Т. М. Горяе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М. РОССПЭН, 2002. С. 336-337.

<sup>③</sup> ГА РФ –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 9425, Оп. 1, Д. 1294. Л. 28-42. Перечит. по: Горяева Т.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М. РОССПЭН, 2002. С. 338.

<sup>④</sup> 1968 年初，捷共中央在杜布切克领导之下推行了全面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主张发展“民主的社会主义”、“具有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是谓“布拉格之春”。“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在国内外都引起巨大反响，苏联《真理报》多次发表文章，提醒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危险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活动”。最终，苏联忍无可忍，声言不能坐视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危险”，联合波、匈、保、民德几个华约成员国，于 8 月 20 日深夜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将捷实际置于苏军监控之下。

<sup>⑤</sup> РГАНИ -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бывший ЦХСД –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 Ф. 4, Оп. 19, Д. 131, Л. 2-6. Перечит. по: Т. М. Горяе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М. РОССПЭН, 2002. С. 339.

部尤其是编辑部领导对党和国家负责), 只把出版后检查留给了出版总局, 几乎所有会引发冲突的问题都在出版前检查时解决了, 出版总局进行的出版后检查不过是在“捉跳蚤”。这种检查制度虽还不是 1970-1980 年代的“自我检查”(самоцензура), 但已经十分接近。这一阶段, 出版总局履行的并不是自己应负的主要职责(出版业国家和军事保密事务), 而只是执行党中央意识形态方面的指令。后来, 这种书报检查制度大体便成为了即将到来的全面渗透政治检查的 70 年代“停滞时期”的基础组成部分。

对于“异端思想”的蛮横打压和强制没有使知识分子们屈服, 他们顽固地继续坚持各自的“不同政见”, 并且在国内掀起了人权保障运动, 他们的有力武器便是“地下出版”方式, 他们充分占据了“第二种文化”——非官方文化, 与官方文化基本维持着一种分裂状态。这种分裂状态令官方检查已无法完成其书报检查的目标, 因为“地下出版物”避过了官方检查, 以秘密途径在社会上流通, 所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书报检查工作中的地位开始变得益加重要, 没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辅助, 那么对于非官方文化的地下出版便无法实施检查和控制。正是在这一时期, 出版总局的评析鉴定职责开始尤为突出: 出版总局的职员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同事一起为党中央准备详细资料情报, 以使中央了解国内文化和社会生活、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情绪以及他们在国外报刊上的反应。<sup>②</sup>

在出版总局 1971 年 6 月 29 日提交给苏共中央的《咨询报告》<sup>③</sup>中, 提出苏联主要的反对力量来自知识分子, 正是以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А. Д. Сахаров)为首的知识分子发动了所谓“抵抗运动”和“民主运动”。该《咨询报告》预示着 1970 年代前半期对于“政治检查”将进行一系列战略战术改良。这一时期,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事前检查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 尤其是它采用侦察手段暗查作家的皮包和抽屉, 将所获相关作家的意图和计划的情报汇报苏共中央。主要负责“预防性检查”工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是其辖下的第五局。在 1975 年 10 月 31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公函《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的预警行动总结报告》(О некоторых итогах предупредительно-профилакт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органов КГБ)中, 指出对苏联公民进行侦察的主要原因便是意识形态监控, 在 1959-1974 年间便有约 6 万公民曾被“预防警告”, 其中近三千人的罪名是从事反苏宣传鼓动活动<sup>④</sup>——典型的即是阅读和传播“地下出版物”和其他“反苏文艺作品”。

这一时期还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索尔仁尼琴被逐事件。早在 1969 年 11 月, 索尔仁尼琴便已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1971 年, 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1914 年 8 月》。1973 年 12 月, 巴黎出版了他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 书中反苏维埃和反社会主义倾向令苏联政府无法忍受。因此, 1974 年 2 月 12 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 将其驱逐出境。此时, 苏联作家协会已经成为书报检查系统中的一环, 它实施检查的形式包括“审理”、褫夺发表特许权、限制出版以及最终开除作协会籍。索尔仁尼琴就是在经历了这些程序之后被剥夺了苏联公民国籍以及流放国外, 在索尔仁尼琴之后, 这种强迫性的移民国外便成为政府对“反党叛国”文人学者的一种温

<sup>②</sup> Горяева Т.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М. РОССПЭН, 2002. С. 340-341.

<sup>③</sup> ГА РФ –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 9425, Оп. 1, Д. 1396. Л. 111-113. Перечит. по: Горяева Т.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М. РОССПЭН, 2002. С. 347.

<sup>④</sup> 皮霍亚:《苏联政权史 1945-1991》, 徐锦栋等译, 东方出版社, 2006 年, 第 403 页。

和镇压，接连有许多此类文人学者都这样被驱逐出境。<sup>②</sup>

1974年11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出版总局的新《章程》，该《章程》带有明显的示范性特点，不具有任何原则性的新变化。1975年12月11日，面对国际社会执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sup>③</sup>（Final file of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的舆论，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Ю. В. Андропов）和外交部长葛罗米科（А. А. Громыко）的报告，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研讨出版法<sup>④</sup>。出版法草案提出了废除书报检查和维护言论自由。但研讨出版法最后不了了之，反而加强了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地下出版物”的抵制力度，继续维持严苛的书报检查体制。由于种种对潜在威胁的忧虑，党和政府没有进行对书报检查的改革，因为“消除任何书报检查”对于苏联当时来说是不现实的，很可能会导致民心浮动、国家大乱。

在书报检查制度的实际操作中，有一个很难攻破的手段，便是在翻译外文作品时进行意识形态修改，这便是所谓的“通过翻译进行的书报检查”（цензура через перевод）<sup>⑤</sup>。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苏联国内通晓外文并不被认为是必须的 and 值得表扬的，很少有人能直接阅读外文原书（而且，实际上也不允许），对于大众来说发现修改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为了与出版和电子媒体进行交流和推广政治检查，在苏共中央还常常召开协商会议，会上不仅有对之前意识形态领域所犯过错进行评析，还经常对信息和宣传资料的内容直接下达指令。1977年5月底，在苏共中央宣传部便曾召开了一次出版、广播、电视机关代表协商大会，会上讨论的问题有继续增强政治警惕性和提升媒体领导对出版材料意识形态-政治水平的应负责任。<sup>①</sup>

这一时期，令书报检查比较关心的是回忆录型作品，这种作品的数量在“出版整风”（упорядочение издания）中大约缩减了一半多。在“出版整风”中，国家出版事务委员会专门就关于回忆录作品的出版问题出台了规程，还为1977-1980年此类书籍出版制定了计划。在计划中最关键的是对作品进行阅评，阅评之后，回忆录作品的印张一定程度上缩减了，同时作品在思想和理论上都得到了保证和提高。<sup>②</sup>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保守势力始终占据着苏联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处于主导地位，改革倾向遭到压制，苏共二十四大后，连“改革”这个词汇也不再出现于正面宣传中，舆论宣传被规限于“完善”既有体制模式——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书报检查制度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大局势基本符合，仍然完全继续严苛的政治检查与粗暴打压，其显著特点在于普遍实行“自我检查”，同时许多

<sup>②</sup> 关于被驱逐的名单参见：Горяева Т.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М. РОССПЭН, 2002. С. 354.

<sup>③</sup> 1975年8月1日，苏联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最后文件中承认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承认战后国家边界和领土完整的不可侵犯性，还承认人权和一定的政治自由权。

<sup>④</sup> АП РФ – Архи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 3, ОП. 78, Д. 8, Л. 136-137. Перецит. по: Т. М. Горяе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М. РОССПЭН, 2002. С. 351.

<sup>⑤</sup> 《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时期外文书籍的书报检查》/Цензу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книг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С. 82-88. Перецит. по: Горяева Т.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М. РОССПЭН, 2002. С. 354.

<sup>①</sup> Горяева Т.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М. РОССПЭН, 2002. С. 357.

<sup>②</sup> РГАНИ –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бывший ЦХСД –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 Ф. 5, Оп. 24, Д. 262, Л. 114-118. Перецит. по: Горяева Т.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М. РОССПЭН, 2002. С. 357.

相关机关（如作家协会）都被一同熔铸进而成为了官方文化的铜墙铁壁。

## 二、图书和期刊出版业管理

赫鲁晓夫的“解冻”余波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十余年与政府进行交流对话的机会。在勃列日涅夫继任初期，与政府进行对话还基本是可以被政府接受的，然而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在“布拉格事件”之后，知识分子的不冷静导致政府被迫终止了友好对话。苏共和政府调整政策，开始对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进行打压，但是一些知识分子仍坚持以“地下出版”形式传播非官方文化，对此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直保持高度警觉并时常进行密切关注，正如长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安德罗波夫（Ю. В. Андропов）在1969年2月给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所说：

“近些年来，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传播散布着一些思想上有害的作品，其中有关于政治、经济和哲学问题的文章，有文艺作品，有寄给党政机关、法院和检察院机构的联名信函，有‘个人崇拜受害者’的回忆录，凡此种种被其作者和传播者称之为‘书报检查之外的著作’（внецензур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或‘地下出版物’。在这些作品中，共产主义建设的个别缺陷被突显为典型现象，党和国家的历史被歪曲，对于党和政府在民族问题、经济和文化发展事务中所采取的措施持有不同看法，宣扬对苏联社会主义进行‘完善’的各种机会主义理论，突出要求废除书报检查、为因进行反苏宣传而获罪者平反、修改苏联宪法。‘地下出版物’通常的传播方式是私相传散手稿、由打字机直接打印、影印复制或者轮转印刷。在‘书报检查之外的著作’的流通中还加入了投机倒把分子，他们广行销售以赚取利润。为了宣传‘私下出版物’，有时还由自发创办的俱乐部和文艺团体组织举行各种类型的半公开学术辩论、歌咏比赛、音乐会，甚而一些在政治方面丧失原则的领导在某些情况下带头出席协助了这些活动。‘私下出版物’的制作和传播在莫斯科尤为突出，这一现象比较集中还有列宁格勒、基辅、敖德萨、新西伯利亚、高尔基、里加、明斯克、哈尔科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卡拉干达、南萨哈林斯克、奥波宁斯科以及其它一些城市和地区……鉴于政治有害书籍的流传对苏联公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教育带有严重的损害，国家安全机关采取了相应措施以压制‘私下出版物’的作者与传播者的活动，制止‘书报检查之外的著作’对苏联人民的恶劣影响进一步扩大化……”<sup>①</sup>

对于涉及“地下出版”的违例案件，国家安全委员会经常援引俄罗斯联邦刑法第70条（对于以损害和弱化苏联政府为目的而进行反苏宣传的罪犯判处7年以下徒刑和五年流刑）施行惩治。但是，由于侦查、审讯和法庭很难证明“以损害和弱化苏联政府为目的”，所以经国家安全委员会首先提出补充修改，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于1966年9月16日下达指令批准了在刑法中加入补充的第190-1条款。该条款所规定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有：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传播诽谤中伤苏联国家和社会体制的谣言；对苏联及其加盟共和国的国旗、国徽进行侮辱；组织和积极参与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暴动。该条款对于“异端分子”（инакомыслящий）所定惩罚较轻——三年以下的监禁，或

<sup>①</sup> РГАНИ -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бывший ЦХСД -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 Ф. 5, Оп. 61, Д. 668, Л. 1-4. Перецит. по: Блюм А. 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 - 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 452.

者一年以下的劳改，或者交纳罚金。在审讯定罪过程中，出版总局及其辖下地方分局所履行的主要职责是对疑犯持有或传播的出版物进行鉴定评估，指出其中具体哪些内容“反苏反社”。依据现有资料，被判决违反刑法第70和190-1条的罪犯，在1967-1976年间，约有1600-1850人，在1977-1980年间有885人（违反第70条——218人，违反第190-1条——667人）。<sup>②</sup>

如上所述，在监督“地下出版”方面，国家安全委员会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出版总局及其辖下地方分局不过提供咨询而已。“地下出版物”所宣扬的非官方文化对于政府危害甚巨，其影响虽然可以强制弱化，但是其所屡禁不止的现象已经反映出了一个更加可怕和更加隐蔽的威胁——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逐步钻入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处。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尤其是进入70年代之后，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毒害蔓延，甚至整体上始终与政府一致的官方文化也难保安然无恙，在某些合法的出版社和编辑部开始频繁发生一些“异端事件”。这一时期，虽然在出版前检查时普遍实行“自我检查”，编辑和作者都处于“责任”威胁之下，但是仍然有人敢于冲破常规，这也就要求进行必要的出版后检查，而出版总局便主要负此职责<sup>①</sup>。

出版总局及其地方分局的工作范围相当庞杂，兹仅以列宁格勒分局为例，在列宁格勒分局递交给列宁格勒州党委书记安德列耶夫（Б. С. Андреев）的《所呈版面政治-思想咨评报告》中列有出版分局所应监督的单位有25家出版社，150个拥有出版权的组织团体（出版社除外），36种期刊杂志，14种公报和学报，127家报社，塔斯社列宁格勒分社以及电视、广播、电影戏剧剧本、文娱演出管理委员会等等。<sup>②</sup>出版分局检查范围如此庞杂，而其编内编外人员却不过200人左右。在枯燥繁重的工作中，检查员一直保持着应有的警惕和细心，如上所提《咨评报告》中对于某些出版社和杂志社在政治思想上的玩忽职守多有批评，本文仅举俄联邦“艺术家”出版社<sup>③</sup>一例，出版分局对该社评述如下：

“在俄罗斯联邦‘艺术家’出版社工作中存有一些严重缺陷。在一系列关于我国文艺生活的出版物中，不适当地将过多篇幅给与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文化中一些非主要人物，片面夸大了一些诗人和艺术家的影响力，诸如古米廖夫（Н. С. Гумилёв）、塔特林（В. Е. Татлин）、玛列维奇

---

<sup>②</sup>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452.

<sup>①</sup> 在“自我检查”的年代，编辑为了消弭自己的“责任”，常常将一些难以抉择的问题提请出版总局负责鉴定评价，而出版总局及其地方分局为了保障自身安稳又往往将这些难题上呈中央和地方党委，因此此处以及前文所说出版总局负责出版后检查并非等于说出版总局不能涉足事前检查（其所涉事前检查乃是在“自我检查”之后，工作比重不大而已）。试举一例：《星》杂志编辑部在发行1978年二月号时曾提请列宁格勒出版分局对于科洛鲍夫和阿列克谢耶夫（В. Колобов и Г. Алексеев）的随笔《安加拉河的金冠》施行事前检查。阅审后并未能得出最后结论。随笔中提及由于国家管理的失误，导致森林乱砍滥伐现象严重，对周围自然环境和苏联经济都造成了巨大损失，并且列举了一些相关材料，这些都是出版总局明令限制出版的内容。但是，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党委对于该随笔曾做出良好评价（1976年），因此列宁格勒分局对于此问题感到非常棘手，故而将此问题呈请出版总局批解决。出版总局，在咨询了国家计划委员会辖下自然保护局的意见之后，批示可以出版发表《安加拉河的金冠》。（参见：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488-489.）

<sup>②</sup>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464.

<sup>③</sup> “艺术家”出版社成立于1958年，位于列宁格勒，主要出版文艺类书籍。

(К. С. Малевич) 等。‘艺术家’出版社(社长Т. Гончаренко, 主编辑Т. Девятков)已准备好出版并提请审查关于艺术家费申(Н. И. Фешин)的一本书(编者Могильникова),费申自1923年始侨居美国直至1955年病故,在该书中其被描写为一位在美国的伟大画家……没能做出保有原则评价的不仅仅是对于费申的创作,而且包括对于费申其人的举动——抛弃自己的祖国,在1936年的一封信中,他曾这样写道:‘作为美国人,我可以自由地在全世界旅游,除了自己的祖国……’该书中有许多针对我们祖国的谰言以及对资本主义世界‘自由’的歌颂。”<sup>④</sup>

随着勃列日涅夫执政中后期的来临,出版界在整体上愈益驯服,而书报检查却没有放松警惕,检查趋于更加强化和细化(检查员在物质奖励刺激下力图细心),兹举1978年与“艺术家”出版社相关的一件事例,摘自列宁格勒出版分局辖下第二处处长上呈给列宁格勒分局局长的报告公文:

“安德烈耶娃同志(Л. А. Андреева)仔细地研查备审材料,能够站在正确的政治思想立场上对其作出评价。在检查波兰的一本书《十月武装起义》(Октябрьское вооружённое восстание)的序言时,安德烈耶娃发现其照片选辑歪曲了1917年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的准备和进程真实情况,没有反映出那一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作用,过多地宣传临时政府成员以及沙俄将军。经列宁格勒州党委同意,对该书照片选辑进行了修改。……安德烈耶娃同志积极帮助局内年轻同志掌握审查材料的方法。她所审查的出版物总量超过300印张。……如若可能,提请晋升安德烈耶娃同志的工资级别。”<sup>①</sup>

相对于图书出版来说,报刊杂志在政治思想上更加容易“脱离正轨”,现存材料中有许多反映此类“脱轨”的文献,本文限于篇幅仅列具关于《极光》(Аврора)杂志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例。首先,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列宁格勒分局上呈给出版总局的一份报告《关于1972年前半年“极光”<sup>②</sup>杂志社政治-思想方面的一些批评意见》。该报告中详细举例评述了《极光》杂志所犯种种政治思想错误,比如:

“在《极光》(1972年)五月号中,编辑部原本打算发表鲍勃夫(В. Попов)的短篇小说《狂热者》(Фаны)。检查员认为该小说卑鄙地企图利用幻想题材以讽刺现实……经我部提请,列宁格勒州党委审阅了该小说,建议编辑部不要发表。在《极光》五月号中,《狂热者》没有得到发表,但是在六月号的幽默故事版块‘大象’(юмористический раздел "Слон")中,经过一些对于内容无甚重大影响的删节修改后得以发表。……该社过于频繁地发表那些审美下劣、思想水平低下且完全不能反映我们青年人真实生活的作品。今年早些时候,列宁格勒作家协会第一书记舍斯金斯基(О. Н. Шестинский)在《接班人》(Смена)<sup>③</sup>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国民生命力》(Гражданский тонус)

<sup>④</sup>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Ф. 359, Оп. 2, Д. 130, Л. 28-48. Перецит. по: А. В. Блюм.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 – 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 465.

<sup>①</sup>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Ф. 359, Оп. 2, Д. 149, Л. 21-22. Перецит. по: А. В. Блюм.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 – 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 490.

<sup>②</sup> 《极光》杂志,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类月刊,自1969年6月起在列宁格勒出版发行,先前曾是苏联作家协会、俄联邦作家协会以及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ВЛКСМ - Всесоюзный ленински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молодёжи)的机关刊物。

<sup>③</sup> 《接班人》为日报,创刊于1924年,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列宁格勒州委机关刊物。

的文章，文中指出：《极光》本被期许负责对青年文艺工作者进行教育，然而它却完全辜负了众望。”<sup>④</sup>

《极光》杂志的“脱轨”问题一直很严重，在 1974 年列宁格勒出版分局呈给列宁格勒州党委的《关于“极光”杂志一些缺陷的咨情报告》<sup>⑤</sup>中对于《极光》上交的准备刊发文稿表示十分不满，指出其中许多作品充斥着消极有害思想以及对于社会阴暗面过分夸大。该报告中例证颇多，仅摘取部分如下：

“众所周知，为了利用民族主义先来毒害青年，资产阶级宣传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破坏活动中主要便是激发民族主义不和情绪。民族主义——以此为枢纽，我们的意识形态对手将所有诡计串联在一起来对苏联人民在心理-政治上的团结统一进行‘粉碎’和‘动摇’。对于资产阶级宣传的这些阴谋诡计，杂志社难道不知道？应当知道。那么，不可理解的是，该社究竟遵循何种原则，居然在二月号中准备发表格雷辛（Г. Горышин）的短篇小说《来自西方的人》（Человек с Запада）。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青年兽医，与其所在的阿尔泰边疆区本地主要居民彼此不睦。……在经过一些不太重要的修改之后，小说更换了一个名字得以发表。……我们苏联诗艺非常丰富多样，其特点是紧跟时代的潮流并且与人民大众的世界观相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极光》杂志却经常关注那一类诗人，诸如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Б. Пастернак）。按照《极光》杂志社的观点，通常来讲，这些诗人的作品乃是衡量生活意义和创作才能的最完满标准尺度。”<sup>⑥</sup>

《极光》杂志虽屡遭指责，但仍然不作根本调整。仅于 1975 年前半年，在经列宁格勒州党委宣传鼓动及文化部门同意之后，便有 7 篇作品被禁止出版发表。<sup>⑦</sup>1977 年 4 月，鉴于《极光》杂志社领导干部对于“应负职责”的“粗心大意”，列宁格勒州党委曾经传召了作家协会组织的领导以及《极光》杂志主编和编辑部成员，向他们出具了近年来他们政治思想工作中犯下的谬误案例。此后，俄罗斯联邦作协列宁格勒分会书记处受命对《极光》政治思想水平低下的原因进行详细调查并采取措施改组《极光》杂志社的编辑部（主编和副主编皆被免职）。在编辑部领导层变动的同时，该社内共产党员的“党员责任”问题也由作协党组织进行审理——该社党委书记和诗艺版块主管都被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值得注意的是，州党委批准了新任主编，而副主编则由出版分局派员充任。<sup>⑧</sup>

关于反映勃列日涅夫时期书报检查对出版影响的资料（如总共有多少删改纪录）非常缺乏，这主要是因为出版总局在苏联解体之前销毁了大量档案文献，所以笔者迫不得已，仅能以目前找到的资料为大家稍作解释说明。在列宁格勒分局上呈给出版总局的一份公函中，其文提及的一些数据或许有些参考价值，如下：

“我局认为，许多案卷材料的应当由‘业务公函’转为‘密函’——尤其是检查员的工作报告（其可

<sup>④</sup>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Ф. 359, Оп. 2, Д. 106, Л. 80-89. Перецит. по: Блюм А. 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 – 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 447.

<sup>⑤</sup>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Ф. 359, Оп. 2, Д. 130, Л. 2-11. Перецит. по: Блюм А. 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 – 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 461-464.

<sup>⑥</sup>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Ф. 359, Оп. 2, Д. 130, Л. 2-11. Перецит. по: Блюм А. 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 – 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 462-463.

<sup>⑦</sup> Блюм А. 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 – 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 477-479.

<sup>⑧</sup> Блюм А. 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 – 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 485-486.

能暴露检查员的工作方法)和‘检查员关于出版干涉的报告’。

列宁格勒分局的工作实践表明,仅最近3年以来,已经进行了大约7000处删改。鉴于通常每次删改都单独填表记录,每月的删改数量经常超过250,因此3年以来我局应当添置30-40卷宗,而这就需要续补一些铁箱和安置房室。基于以上原因,建议授权分局在收获出版总局的回文后销毁检查报告。”<sup>④</sup>

### 三、图书馆藏书清理

在赫鲁晓夫“解冻”的大背景下,大量非社会主义信念和非共产主义理想的的书刊得以出版,虽然这些书刊在赫鲁晓夫时期已屡被禁毁,但还是有许多进入了大众图书馆且可以流通借阅。图书馆一些职员对于出版总局下达的禁令往往粗心大意,而且各地方出版分局由于人手缺乏,也不能进行全面彻底清查而只能采取不定期抽查,这也就一定难以避免存在疏漏,必然要求进行连续不断的抽查和清理,现有资料中频繁的图书清理指令便反映出了这一情况,比如1973年列宁格勒出版分局上呈列宁格勒市党委书记的咨情报告中所说:

“今年5-6月,依据图书馆普通书库有关清理指令,我局工作人员对列宁格勒市21所图书馆的藏书进行了抽查。调查表明,大多数图书馆没有及时从相关部门接收到出版总局普通书库清理指令,而有时图书馆的一些职员对于完成指令态度粗率,这便导致应当没收的书籍继续存留在普通书库且仍被借阅流通。”<sup>①</sup>

在此次抽查过后不久,也就是1973年8月,列宁格勒分局再次进行了一次抽查。在这次抽查过程中,在果戈里图书馆(библиотека им. Н. В. Гоголя)查出了涅克里奇<sup>②</sup>的3本违禁书籍,这3本书自出版总局发布清理指令(1967年8月18日)六年以来一直没被清除。果戈里图书馆馆长借口这3本书并没有存放于普通借阅处而是存放于保险书柜,但是依然遭到了批评,因为指令明白规定应当清理的书籍必须立即上交特藏书库或者依照规定程序销毁。<sup>③</sup>

应当指出的是,以现存材料来看,各地出版分局对图书馆的抽查一直未曾间断,图书馆的违禁书籍也陆续被清理,但图书馆的职员对于清理工作却从来也没有认真对待。对于图书馆藏书清理工作的实际运行,各出版分局表示非常不满,兹以1978年列宁格勒出版分局上呈列宁格勒州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报告》<sup>④</sup>中所述情况为例。在该报告中,列宁格勒分局指出,经过1977

<sup>④</sup>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Ф. 259, Оп. 2, Д. 153, Л. 43. Перецит. по: Блюм А. 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 – 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 508.

<sup>①</sup>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Ф. 359, Оп. 2, Д. 113, Л. 38-42. Перецит. по: Блюм А. 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 – 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 457-458.

<sup>②</sup> 涅克里奇(А. М. Некрич)1920年生于苏联,1941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942年参加反法西斯战争,194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3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长期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苏联史和国际关系史。1965年,他发表了《1947年6月22日》一书,尖锐批评了苏联领导在苏德战争前夕所奉行的政策,由于他坚持自己的观点,1967年被苏共开除党籍。他的《被流放的民族》一书是1975年在苏联写成的,并于同年把书稿寄往国外。1976年,他被迫离开苏联迁居美国,在美国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工作,并在大学任教。

<sup>③</sup>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Ф. 359, Оп. 2, Д. 111, Л. 21-29. Перецит. по: Блюм А. 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 – 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 460-461.

<sup>④</sup>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Ф. 359, Оп. 2, Д. 147, Л. 2-3. Перецит. по: Блюм А. 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 – 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

年和 1978 年初对本地区 45 所图书馆的抽查，结果发现许多图书馆竟然没有出版总局图书馆藏书清理指令（许多图书馆领导接受指令乃是经由口头或电话通知），这也就导致他们不可能清楚何种书籍应当立即没收上交和禁止借阅，而存有出版总局图书馆藏书清理指令的图书馆也没有认真执行，许多政治有害书籍依然存留于普通书库和在读者中流通。在报告文末，列宁格勒分局提请由文化部负责完成出版总局图书馆藏书清理指令，对于图书馆藏书实施有效的监控。

关于反映勃列日涅夫时期图书馆藏书清理的整体情况的材料目前尚缺，故而只能如上文一般列举稍可参考的一些资料，如 1978 年 9 月 26 日列宁格勒出版分局上呈列宁格勒州党委的公函：

“为了弄清各书库是否及时清理了应当限制流通的书籍以及书籍保藏和借阅规定是否得到遵守，列宁格勒出版分局对于普通图书馆、各部委图书馆、各社会组织的图书馆以及特藏书库进行了抽查。

仅在过去的一年，我局便抽查了 435 所图书馆，查明了国外作者 13338 本政治有害书籍。除此之外，376 本书被没收销毁，其作者大多是持不同政见者。……

对于那些未能完成监督清理书库政治有害书籍指责的领导干部，各区党委处理得不够严格。在方法问题上，应当增强政治教育局图书馆的威信。关于清理有害藏书的问题，应当促使图书馆领导干部积极实施有效而及时的监控。”<sup>①</sup>

#### 四、电影、戏剧和博物馆展览管理

在出版总局成立之初不久（1923 年），其业务便已迅速普及扩展至一切精神文化领域。<sup>②</sup>那时对文化领域负主责的是剧目检查主管委员会（Главный комитет по контролю за репертуаром），其职责有审查所有将要公演的话剧、音乐以及电影作品，检查无线电广播，编制颁布经允许和被禁止的剧目，监督相关规程条例的施行，同时也负责与剧作家和电影团体相关的工作，组织有关剧本、戏剧和电影的讨论。剧目检查委员会一般分为两大部门：话剧-音乐局和电影局。在讨论总体问题时，一般要由党代表、工会和其他相关组织的代表一起组成艺术-政治协商会（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совет）进行咨询协商。

1928 年，剧目检查主管委员会成为文艺事务总局（Главискусство –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дела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的组成部分。1933 年，其再次成为独立单位——剧目与演出检查管理局（ГУРК – 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контролю за зрелищами и репертуаром）。1953 年，撤除了剧目与演出检查管理局，成立苏联文化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культуры СССР）以统一管理文化事业。

直接负责对影视和剧院实施检查管理的是文化部和电影委员会以及他们的下属地方分部，而出版总局及其辖下各地分局所履行的职责乃是对这些单位工作进行监督并对其工作失误进行校正。但

---

487-488.

<sup>①</sup>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Ф. 359, Оп. 2, Д. 147, Л. 222.

<sup>②</sup>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Ф. 731, Оп. 26, Д. 13, Л. 7.

是，出版总局并非握有完全的最终决定权，对于普及的影视剧作品，往往需要地方党委甚至党中央文化部门最后把关以保证万无一失，比如塔尔科夫斯基<sup>⑨</sup>的《安德烈·鲁勃廖夫》(А н д р е й Р у б л е в)。

《安德烈·鲁勃廖夫》是塔尔科夫斯基第一次自编自导的作品，一部描写15世纪圣像画家安德烈·鲁勃廖夫的人生传记片，背景是诸罗斯间的战争和蒙古鞑靼人的入侵。该片于1964年9月开拍，1965年11月封镜，1966年8月完成后期，倾注了塔尔科夫斯基数年心血。这部电影遭到了急风暴雨式的批判，随之而来的便是禁映。该片拷贝通过非法渠道运出境外，在西方立即引起轰动，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们将其评为1969年度的评委大奖。对此，苏联国内先是如往常一样冷处理，媒体一言不发，后于1971年8月24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下达特别指令许可公映《安德烈·鲁勃廖夫》(经苏联电影委员会和莫斯科制片厂的多位可信导演删改后的版本)，但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附中提出在评价时应注意将该片的积极与消极因素指明。<sup>①</sup>

文化部对各剧种剧本的审查经常处于一种不负责任粗心大意的状态，许多政治思想有害的剧本得以轻松过关，这令负责监督其工作的出版总局及其各地分局非常不满，如列宁格勒分局在其上呈列各格勒是党委的一份报告中批评指出：

“列宁格勒地方执行委员会辖下的文化厅批准了德鲁蔡(И. Друцэ)的《众善之善》(Святая святых)在科米萨尔日夫斯卡娅剧院上演。……该剧本中大量陈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下的不合理方面、滥用职权的状况、弄虚作假以及社会蛊惑的问题，并最终将这些绘制成一组社会主义体制惨无人道的尖锐画面。……对于这些现实，剧本中唯一的正面主角做出如下论断：仍未被打败的法西斯主义的所有这些显像现如今‘肆无忌惮地盛行于世’。……该剧对于民众和领导的相互关系没有做出正确真实的反映表现，并且使他们在对真理正义和国家利益的认识上彼此相抗，对于一些缺憾不足做出了片面的概括。若不做出重大修改，断不能批准该剧在列宁格勒的剧院上演。

在我部看来，列宁格勒地方文化厅对于剧本思想艺术质量的要求不够严格，也没有进行耐心的审读，匆匆忙忙地便对需要仔细研究的剧本予以认可批准，没能督导剧作家和剧团深入生活、理解现实以能够不低于当今一些最重要的精神问题的层次水平。”<sup>②</sup>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早期直至二战结束，物质文明建设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博物馆和展览会并不常见，而笔者现有档案资料关于此一方面检查的内容及其匮乏。当苏联取得了超级大国地位，物质方面不再贫乏，精神文明建设自然亦随之逐渐丰富。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现有档案中开始出现了能反映出版总局对于博物馆和展馆会的实施管制的资料。

<sup>⑨</sup> 塔尔科夫斯基(А. А. Тарковский)，生于1932年4月4日，其父既是导演也是诗人。塔尔科夫斯基于1954年考入国立莫斯科电影学院，毕业作品是和同学合作拍摄的《小提琴与压路机》。首部剧情长片《伊凡的童年》获威尼斯影展金狮奖，其后每部作品均获得众多国际殊荣，很多评论家视《安德烈·鲁勃廖夫》为他最伟大的杰作。1983年，塔尔科夫斯基获准以《潜行者》导演的身份到意大利参加威尼斯电影节，他借此机会“自我放逐”脱离苏联国籍，最后于1986年12月28日因肺癌逝世于巴黎。塔氏作品以如诗如梦的意境著称，主题宏大，流连于对生命或宗教的沉思和探索。

<sup>①</sup> РГНИИ -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бывший ЦХСД -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 Ф. 5, Оп. 64, Д. 72, Л. 27-32.

<sup>②</sup>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Ф. 359, Оп. 2, Д. 130, Л. 83-88.

现有资料中有一则比较有特点的档案：1972 年，关于一幅历史展览画公展与否的问题，（列宁格勒州）湖滨区方志博物馆同列宁格勒州出版分局发生意见不合，博物馆领导不服出版分局检查员的指示，不仅回文辩驳而且扬言将向上级组织呈文上诉（虽然最后亦无果而终）。现将该博物馆领导波将金（Л. И. Потемкин）上呈列宁格勒州出版分局局长马尔科夫的公函陈列如下：

“库尼岑（Т. Куницын）同志将您的指示转交给我，我馆不得不执行。关于科克斯果里姆斯基团（Кексгольмский полк）历史的展览画意境暂时撤下，之所以是暂时，因为我们断然难以认同库尼岑同志的看法——即这幅展览画没有教育意义。科克果里姆斯基团是俄罗斯历史最悠久的军团之一，参与了许多著名战役……该团系彼得一世于 1710 年创建，如您所知，现今报刊甚至登载纪念彼得一诞生两百周年。

展览画描绘了该团自 1710 至 1910 年的战斗历史。至于其中提及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f I），在我们看来，这并不能成为撤消展览的理由。因此，我们保留今后使用该展览画的权利并将向上级组织呈请解决该问题。”<sup>①</sup>

关于博物馆和展览会的检查方式，现存材料中能最佳反映这一问题的是 1982 年 3 月的一封公函中随附的《博物馆和展览会预定展览物品准备材料与提请出版检查机关监督规程》，兹摘录部分如下：

“公开博物馆（社会组织博物馆除外），不论其部门所属，必须在得到苏共中央或者联盟共和国党中央的批准之后方能向大众开放。

无论处于国内国外，长期、临时和移动博物馆，社会组织的博物馆，工业、建设、农业、科技等其它展览会，历史博物馆，革命历史展览会和博物馆（苏联时期），方志学、科学技术和自然博物馆，其展览材料（包括图表、文字和录音）以及国内所有公开展览会和博物馆参观者留言案卷皆归属苏联出版总局各检查机关监督。

附注：参观者留言案卷应以未编号活页保存。负责展览准备的组织机构，在准备展览会（博物馆）的陈列品时，必须向苏联出版检查机关呈交：

1) 该组织机构的基本资料；

2) 经相关部门机关和组织批准的展览分类计划，一式两份。展览分类计划应当包含所有的文字和图表材料（包括声电展览台的播音文稿、照片、表格、线路图等等）。

一份展览分类计划，在加盖‘准予参观’印章并经出版检查机关同志签字后，返还展览会（博物馆）领导，另一份则留存于该检查机关直至展览结束。……违反本规程将按规定追究责任。……”

②

## 五、“犹太问题”专项管理

斯大林逝世之后，赫鲁晓夫一上台就宣布释放“医生阴谋案”中被捕以及此案牵连的犹太人，放宽了对国内犹太人的政策：下令开放犹太会堂，放宽犹太人入学限制，准许出版意第绪语刊物、

<sup>①</sup>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Ф. 359, Оп. 2, Д. 107, Л. 54-55.

<sup>②</sup>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Ф. 359, Оп. 3, Д. 186, Л. 11-19.

举办意第绪语音乐会等等。但是，社会排犹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鉴于国际事务中的冷战局势，赫鲁晓夫更注重的是阿拉伯盟友，苏联政府并未一如既往地强调谴责反犹主义，犹太人在宗教、文化、教育、就业等方面均受到一定限制，官方意识形态中的“反犹太复国主义”也一直没有松动（在解冻时期，“犹太复国主义毒害”出版物依旧属于查禁之列），这种状况基本延续至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

勃列日涅夫在中东问题上继续发展了赫鲁晓夫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战略，而且在苏联犹太人移民政策问题上的两国多有纠纷<sup>③</sup>。1966年，书报检查中重新遇到了如何处理列宁母系犹太血缘的问题，沙基娘（В. Шагинян）的历史小说《乌里扬诺夫一家》（Семья Ульяновых）中所引档案暴露了“秘密”，针对此一问题，国家出版委员会上呈给苏共中央的一份详实报告：

“多才多艺的作者……试图引领读者相信乌里扬诺夫家诞生的小男孩是由助产护士私自起名为弗拉基米尔。现如今，据非官方材料，沙基娘搜集了许多关于列宁母系家谱的资料……此一想法无甚创新，西方早已有类似的书籍，资产阶级作家们竭力证明俄罗斯的天才人物列宁乃是俄罗斯—蒙古—德国—犹太—瑞典的混血儿。

应当批评并帮助作家分析研究这一问题。而俄联邦作家协会总书记在大会登台作报告之前应当事先私下阅读该作品，而不是依赖于其他同志的鉴赏和评价能力。”<sup>①</sup>

进入20世纪70年代，苏联开始与以色列缓和关系，大大放松了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审批。在1967—1972五年间，根据相关指令，出版总局曾对苏联国内所有稍涉“犹太问题”的一切出版物进行了全面审查。全面审查的成果便是1973出台的新查禁书目，在新的查禁书目中“犹太问题”相关的出版物比1961年查禁书目总所列增加了一倍有余。新查禁书目中所列的许多革命胜利早期出版的犹太书籍早在30年代便已消亡殆尽，值得一提的是书目中加入了国际犹太复国主义所有领袖人物的书籍以及20年代出版的所有犹太报刊，甚至许多以纯苏联式的“国际主义”立场批驳“反犹主义”的书籍也列入其中。俄罗斯学者布留姆为此评价：“显然，提及‘犹太人’、‘犹太（人）的’一类单词便已成为查禁的理由。”<sup>②</sup>

增长迅速的“地下出版物”中当然包含许多于官方意识形态对立的“犹太地下出版物”。对于这些绕过了书报检查机关的“地下出版物”只能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查禁，而当国家安全委员会就缴获的不法出版物向书报检查机关咨询时，其中许多书籍出版总局一时也不能做出评判，因为这些出版物大多缺乏出版信息资料。<sup>③</sup>

在官方合法出版中，犹太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极需小心谨慎的领域，相关书籍和文章的发表往往要“费尽周折”历经多个部门的联合审查，兹举一例：

<sup>③</sup> 苏联犹太人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如能大批移民以色列，那么以色列的综合国力将大大增强，因此以色列一直坚持不懈的要求苏联放宽移民政策。苏联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采取人口增殖、限制人口外流的政策，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犹太人当然希望他们继续为苏联建设贡献力量，因此自以色列建国至六五战争爆发苏以外交关系中断获批移民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共约200多万）仅8442人。

<sup>①</sup> ГАРФ –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 9604, Оп. 2, Д. 626. Л. 3.

<sup>②</sup>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под советской цензурой: 1917-1991. СПб.,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еврей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96. С. 144-146.

<sup>③</sup>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под советской цензурой: 1917-1991. СПб.,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еврей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96. С. 156.

1981年4月，列宁格勒的《涅瓦》(Нева)杂志准备在该年五月号上发表科尔涅耶夫(Л. Корнеев)的《谁将得利——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心理战争》(Кому это выгодно.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ая вой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ионизма)，列宁格勒出版分局在审阅后不敢独断，便建议杂志社将该文文稿呈送相关部门——苏联外交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科学院——提请审查并要求提供评价鉴定意见。外交部当然不愿多事担责，只是用含糊的公文语言回复：“在现时期，文章就一些基本原则问题所进行的阐述存在某些值得怀疑之处，为了尽可能适宜，建议杂志社咨询相关意识形态机关。”<sup>④</sup>

外交部的回函日期是1981年4月21日，此后杂志社开始等待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苏联科学院的回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回函于该年7月23日发还，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辖的出版部对科尔涅耶夫的《谁将得利——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心理战争》进行了仔细审查并提出了非常细致的修改意见：

“从整体上说，按照我们的意见，无论是在叙述方式上还是在内容实质上，该文都必须进行仔细修改。在对犹太复国主义进行批判的时候所用的骂人口吻可能是不适宜的，因为批评需要的是合乎逻辑、冷静以及有科学依据且具有说服力的分析。作者可能没有注意，他有时将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混为一谈（第3页和以后多处），有时又将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混为一谈（第30页），这些很可能会误导读者。文章未必恰当之处还在于，在一篇披露犹太复国主义的文章中援引并在某种假设上采用了一个不著名的俄罗斯人物（乌多多夫(Удодов)——一个刑事犯，因性虐待杀人罪而被惩处驱逐出境）对于资产阶级-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的论点（第1-2页）。”<sup>①</sup>

苏联科学院负责审查该文章的是协同科学批判犹太复国主义常设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п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научной критики сионизма при Президиуме АН СССР），其鉴评回函直至该年11月9日才送达《涅瓦》杂志社：

“现时问题文章的写作是应当支持的，但杂志社编辑部和作者必须注意进行一些编辑修改。尤其是在第3页，应当更加清楚地表述在以色列地区形成的犹太民族这一观点，同时还有苏联犹太人的权利也应当表明（相关修改在文稿上）……我们认为可以讲题目换为《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心理战争》。结论：参照以上所指进行仔细编辑修改之后，该文可以推荐出版。”<sup>②</sup>

在经多部门联合审批之后，已经接近1981年年底，因此《谁将得利——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心理战争》没能在1981年发表，最后终于得以在《涅瓦》发表是在1982年5月。<sup>③</sup>

#### 第四节 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终结

1982年11月10日，苏联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病逝。自此苏联历经安德罗波夫(Ю. В. Андропов)和契尔年科(К. У. Черненко)的短暂执政，越来越接近苏联发生巨变的大改革时期，

<sup>④</sup>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Ф. 359, Оп. 2, Д. 190, Л. 120.

<sup>①</sup>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Ф. 359, Оп. 2, Д. 190, Л. 121-122.

<sup>②</sup>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Ф. 359, Оп. 2, Д. 190, Л. 122-123.

<sup>③</sup> Блюм А. 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 – 1991.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4. С. 514.

虽然书报检查系统一直努力在新环境下继续保存自己以往的地位，但是随着 1985 年 3 月戈尔巴乔夫（М. С. Горбачёв）上台，一切都不得不改变了。随着以“公开性”、“民主化”和“政治多元化”为基调的政治改革的深入，书报检查机制对出版的限制也越来越宽容。

1990 年 6 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在经过长期讨论之后，终于最后批准了苏联出版法《关于出版和其他大众媒体》（Закон СССР о печати и других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该法案以法律的形式结束了早已形同消亡的出版前检查。出版总局经过改组变成了出版业与大众媒体国家保密事务管理总局（ГУОТ -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охран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тайн в печати и других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при Совете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1991 年 4 月改为隶属苏联信息与出版事务部，1991 年 6 月改名为苏联信息与出版事务部下的大众媒体国家保密事务管理代办处（Агентство по защит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секретов в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пр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е информации и печати СССР）。<sup>①</sup>

出版总局在改组过程中也进行了一些粉饰门面的改革，最明显的便是出版总局的工作人员数额缩减了 30%，但出版总局的领导层基本没有任何变化，与此同时，依据苏联最高苏维埃指令《关于维护社会道德和制止残暴、色情宣传的紧急措施》（О неотложных мерах по охран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и и пресечению пропаганды насилия, жестокости и порнографии）和《苏联总统名誉和威严保护法》（О защите чести и достоинств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ССР），仍然有不少人被判有罪和处以刑罚。<sup>②</sup>在不及三日的“八一九”事变中，出版总局再次试图恢复以往的辉煌，虽然事变很快被平息，但事变后依然不放弃其努力，开始采取更加隐蔽形式——尤其是以“经济和商贸资讯保密”为根据继续进行广泛的书报检查。1991 年 10 月，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通过决议终止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出版总局机构的活动，而苏联的出版总局，直至苏联解体之后，才正式结束了其近 70 年的历史。<sup>③</sup>

---

<sup>①</sup> Горяева Т.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М. РОССПЭН, 2002. С. 377.

<sup>②</sup> ГА РФ –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 9425, Оп. 2, Д. 1092. Л. 183-187; Д. 1117. Л. 15 и др. Перецит.

<sup>③</sup> ГА РФ –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 9425, Оп. 2, Д. 1119. Л. 40-41.